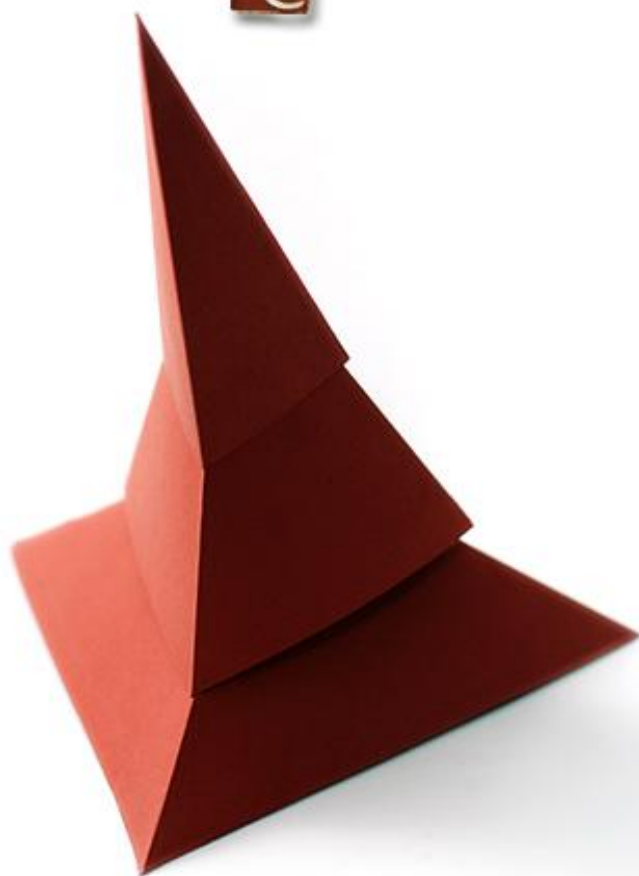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1月15日第28期 总第17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4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五）

目 录

【专 稿】

孙怒涛整理 清华校友热议钱理群的《群众政治》一文 2--34

1. 【综合评论】 2. 【重点探讨】 3. 【精彩点评】

4. 【纠错指正】 5. 【钱老回应】

【评 论】

赵惠中 台前与幕后——北京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简评 35--47

智 晴 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 48--51

舒 声 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 52--56

黄虹坚 历史的求索 ——《抢救记忆》阅读随想 57--60

【述 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二） 61--69

——“二月兵变”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七） 70--76

——对我的审查拉开帷幕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77--91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三）

【重要通知】 91

【本刊声明】

【专稿】

清华校友热议钱理群的《群众政治》一文

孙怒涛 整理

《记忆》170期刊登了钱理群先生《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的长文。清华的一个微信群热烈地讨论了这篇大作。

【综合评论】

孙怒涛先说了几句开场白：钱理群教授的长篇大作以清华文革为案例，对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将整个清华文革置于这个新的维度中，以严密的思维，开阔的视野重新给予梳理和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这是一篇有关清华文革的重量级论文，值得我们细读和研讨。

孙怒涛的读后感：

(一)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

怎么描述这场政治斗争？方家众说纷纭。

钱文提出了这是一场由独裁、官僚、群众三方缠斗的政治斗争。

文革的主脉络是：在初期，独裁政治联合群众政治向官僚政治发起猛烈冲击，取得了夺营拔寨斩主帅的伟大战果。但因群众政治的内讧和官僚政治的反扑，独裁政治无奈抛弃了群众政治。之后，独裁政治也因其内讧和官僚政治的多次顽强抵抗，在主帅归天之后迅速覆灭。文革以官僚政治的最终胜利而告结束。在这过程中，各种政治有进攻有退却有反攻，有联合有抛弃，有投靠有离心，有内讧有分化，有安抚有镇压。这场气势磅礴、扑朔

迷离的十年内斗，堪称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

以三种政治形态的大格局来评判文革并给文革进程一个比较合理的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这是钱文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

以三种政治来审视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不仅得到了相当完美的解释，而且，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赋予了全新的有趣的含义。

譬如，“权经”和“蒯选”体现了官僚政治对群众政治激进派的同化，大多数干部亮相到414则体现了官僚政治对群众政治温和派的渗透。

譬如，四派强夺广播台和团派挑起百日武斗都体现出群众政治暴力化的倾向和对独裁政治资源的继承。

等等。

这对清华文革中虽同属于群众政治的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三兵（老兵、老团、老四）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揭露。老红卫兵服务于官僚政治，与官僚政治同命运共存亡（能喊万岁的只有“八九”）；团派既依附后又偏离独裁政治，因而始被重用终被抛弃；414打着忠于独裁政治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有利于官僚政治的事情（提出以维护官僚政治为核心的四一四思潮，对抗独裁政治的马前卒团派，等等）。

(三)

钱先生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经历，却能写出这样一篇对清华文革有着深刻理解和透彻分析的大作，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全国文革的大局观。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视野来解剖清华文革这只“麻雀”，就能精准把握。其次，他在人文学科上的深厚学养，也是我们这些精于技术的工程师所远远不及的。虽然他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现场，却也因此没有派别情感和人事瓜葛，倒成了非清华人评判清华文革的独特优势。

统观清华老六届写的评述清华文革的文章，只有杨继绳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即拙作《良知的拷问》一书之序言）可与钱文相媲美。

对文革反思研讨的文章，如沈昆、陈中平、张比等校友写的都很不错。但有一些校友的文章只能算是议论文，连形式上都不够论文的规格。

尽管清华文革比较典型，但与全国的“波澜壮阔”相比，清华只能算是一个“象牙塔”。

提高自身的修养，跳出清华的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全国文革的视野再来研究清华文革才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清华人应虚心地向校外朋友，特别是向着名的专家学者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四）

钱先生的“三种政治”论对文革进程，无论是全国的或是清华的，都能有比较完美的诠释。但“三种政治”在文革的酝酿阶段是如何体现的，没有充分地解释。

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本是一体的，本质上是相通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都由毛刘周陈林邓等创建，它们的核心都是一党专政。何以，何时，形成了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这两种政治的矛盾为什么会尖锐起来，最后非得以你死我活的火并来解决？

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都是对文革起源的解释，似乎头头是道，各有所据。钱先生如何以“三种政治”来解释文革的起源，看来需要另文阐述，在此文中也应简略提及。若果如此，“三种政治”论可望成为诠释中国文革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五）

有一点要特别提一下的：文革之初，钱教授已经毕业离京，他不了解清华文革，更没有清华文革的现场感。他之所以能评述清华文革，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众多的清华文革亲历者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钱先生的写作也是出了一点力的。

这些文字，有原始的资料，有真实的回忆，还有沉重的感悟和深刻的反思。仅文革的专著就有十几部。如《历史 拒绝遗忘》这部文集，收录了50多位校友（朋友）撰写的近70篇文章，如实记载了清华文革的基本全貌和各个阶层人们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唐少杰教授对我说：“文集在校内外，国内外，反响甚好”。

我想象，在文革百年之后，那些研究清华文革的历史学家们，还有读这些书籍了解文革历史的年轻人，他们会感谢我们。同时，也可能会有不满意：清华的学子们为什么不再多写一点精彩的故事和生动的情节呢？

留下真实的回忆和思考，仍然是清华文革亲历者们最后的历史责任！

杨继绳的读后感：

（一）

这是写清华文革最好的一篇文章。近几年清华人写了大量的回忆、反思文革的书籍和文章，看来钱先生读了不少。他把清华人的这些著作提炼了、升华了，浓缩成了有历史事实、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深度的一篇宏篇巨制。这不仅对清华人的反思文革有很大启发，对所有人认识文革也有很大启发。

（二）

近几年来，每次清华人集会反思文革，我都建议不要纠缠在武斗中谁是谁非的细节，着重挖掘清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和上层政治斗争的关联，要把清华文革放在全国文革的大背景中，放在高层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中。但“身在庐山中”的清华人还是难以跳出对细节的纠缠。钱先生的文章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我虽然写了《从清华看文革》一文，但写得不深，钱先生的文章真正做到了“从清华看文革”、“从文革看清华”。

（三）

钱文说：“刘少奇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以维护和强化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的绝对领导，集权于党的官僚体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所在：要建立一个‘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个人集权统治，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在维护一党专政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

我觉得钱先生对毛、刘文革指导思想的实质性归纳很到位。这两种指导思想在1966年2月-10月表现为毛、刘直接对立。刘倒台以后表现为毛与军政官僚集团的对立。由于科层制（即官僚制）为管理社会所必需，所以，毛发动群众砸烂旧的政府机构以后，没有制度创新，只能向官僚集团妥协，回到文革前的制度。

（四）

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分析文革的新框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独裁政治——群众政治——官僚政治’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文革的基本内容，并构成了文革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为了和官僚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可以给群众政治以相当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发展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一旦他要回归官僚政治，向其妥协，也随时可以扼杀群众政治：清华文革，以致整个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始放终弃的过程。”钱先生在文中对群众政治作了深入的分析，很有价值。

不过，钱说“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我觉得用“个人独裁操纵群众政治”比较合适，“结合”的双方是平等的，不能一方跪拜在另一方面前。毛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钱文也说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的关系。我们在前文的讨论里，比较强调文革群众政治对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政治的依附性，这确实是两者关系的主导方面，而且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但如果把这种依附强调得过分，也会对历史的复杂性形成遮蔽。”他说的“历史的复杂性”可能是指群众对毛的指示为我所用，毛想操纵也操纵不了。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淡化群众政治对毛的主从关系。所以，我曾著文强调“毛——造反派——官僚集团”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需要官僚集团。为了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科层制度（即官僚制度）是不能缺少的。因此，毛不得不向官僚集团妥协。这场三角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苦

果的是造反派。”

(五)

对《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看法。钱文说：“四一四思潮的内在逻辑就自然通向了十七年的官僚政治。”“414派基本上是一个‘十七年派’，即主张回归十七年的官僚政治，”“打出了一个‘全面恢复十七年体制’的旗帜，也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完全同意钱先生的这一看法。其实，《必胜》并不是多数414人的看法。周泉缨是我的同班（大班）同学，直到今天我们的关系不错，但看法不一，有同学说我们二人是“和而不同的典型”。当年我和他都是“云水怒”战斗组的成员，我是组长，他是发言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请看当年我的日记。

1967年12月14日：“我是一个站在414营垒里而不为414英勇奋战的人。其所以站在414营垒是因为去年8月的战友都在414里，那时我们在一起为反抗工作组和‘伪三临’而战斗。为什么不为414英勇奋战呢？因为对414的一些观点我不能接受。为此我曾同周泉缨吵过。”“当前争论的实质是：对清华过去17年怎么看？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团派认为黑线为主，414认为对过去17年要基本肯定。我认为清华过去17年的组织路线和教育路线是应该否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团派一边的。”但是，团派说我右倾，我不可能靠近团派。

我在“团”“四”之间摇摆是因为我困惑。

1967年9月6日日记：“一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1，过去17年怎样估计？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吗？2，干部问题：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凡是第一把手都被打倒？这些人都是坏人吗？如果过去17年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那这种路线是谁去贯彻的？为什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实际情况有如此大的出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精神与毛主席对北大“6·18”事件的态度相矛盾？3，阶级队伍、阶级路线问题：在中国是否形成了特殊阶层？17年来我国阶级关系有何变化？为什么出身好的保守多，出身不好的造反多？”

作为专业课程很重的工科学生，读政治书籍不多，这些困惑也是很肤浅的。

抄下这些日记供钱先生研究清华文革时参考。

(六)

钱文立场客观，语气平和，叙述中性。而“身在庐山中”，清华人写的文革回忆和评论带有感情色彩。作为冷静的历史研究，钱先生的文章有价值。

钱文也有不准确之处，如：蒯大富当时不是“首都三司负责人”，是朱成昭让他念稿。

王铁藩：群众政治刍议——钱文读后感言

(一)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独裁政治——群众政治——官僚政治’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文革的基本内容，并构成了文革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钱先生这段别开生面的文字，极大地丰富了文革研究。特别是“群众政治”一说，尤为抢眼！古往今来，群众从来是历史的，更是政治的配角；文革尤甚——既是群氓，又是傻子。钱先生竟将其赫然与独裁者，与官僚鼎立，真的是颇见胆识。

什么是群众政治？

依据钱文可作如下表述：在六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言论，结社的社会环境中，群众摆脱官僚控制，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组成群体自己管理自己并参与社会事物。

群众政治是幻象还是事实？

“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清华大学历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最为独特的时期。由于停课，校、系各级的行政、教务管理几乎全部停顿；由于对党委的否定和冲击，校、系、班级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不再发挥领导作用。整个学校工作的运行，运动的推动，改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这样的以群众政治取代官僚政治，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历史空

隙……”——钱文对当时清华园状况的描述大体得当，其群众政治之说与历史吻合。

群众政治之说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揭示历史事实；它将再次颠覆流行于世的对文革的认识。比如官方的：谁谁发动的，被谁谁利用的之说。比如民间的，骗子，疯子，傻子之言。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搞出动静天大的，历时十年的文革，却仅仅是一个领袖，几十上百个官僚在作怪——真真的是天方夜谭！

群众政治为文革研究又开辟一个作业面，期待亲历亲为的人们努力挖掘。

（二）

钱文将文革的群众政治期，称之为“难得的历史空隙”，并在这“空隙”的时间段内，挖掘出群众政治的正能量（套用时髦）。比如，“在摆脱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掌控，群众政治主宰的校园里，出现的……思想解放，参与政治，独立自主的意识与能力的训练，以及自我启蒙，无论如何，都应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比如，“群众政治中所形成的不同派别……容纳了同学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要求，反映了各自不满的诉求，它焕发出来的蕴藏在人们身上的责任感、创造性、效率与学习能力，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甚至“可以将它们看成是两党政治的雏形”。——以上这些文字基本上是援引清华人的原话或原文，应该是真切的感受的反映。此处可再举出“难得的历史空隙”里的“难得的言论自由”的一个例子。老蒯清华园“占山为王”的日子里，“大王爷”竟没有一天不挨骂挨批的——翻开邱心伟编撰的《大事记》，即便不是每天，也是隔夜就有挨批挨骂的大字报；不仅有老四的，老团的也不少。令人记忆颇深的，当数老蒯与老谭（浩强）你来我往的公开信。不论其中的是非曲直；试想，在蒋南翔校长治下，老谭有那个胆量吗？即便有，老蒋能屈尊以就吗？——至于这些，对于文革在整体上有何意义，自可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当群众感知到并不放弃任何的那怕是极其微小的进步，群众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当另一个难得的“空隙”出现时，群众政治或当成为主宰！——这就是钱文提出群众政治的深意！

（三）

“造反派真的反了！”出自独裁政治的这句既惊异又无奈的话，被钱先生和秦（晖）

先生不约而同地引用，作为令独裁政治决心将造反派赶下文革舞台的动因，是否如此另当别论，但搬起石头砸独裁政治自己的脚却实实在在。正如钱文所说，文革群众政治与独裁政治虽是依附关系，但细究起来，各个组织，甚至各个组织中的不同派别，首先考虑自家的利益。最高指示合意就用，不合意的，曲解后再用。比如造反派，虽然总体的造反目标都是官僚政治——这一点符合独裁政治所需，故而可称为奉旨。但是，各自心里有各自造反的小九九，即原生态的造反动因。文革中令独裁政治头痛的第一件事，就是经济主义歪风，或称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此风从上海刮起，继而如台风般刮到大江南北，遍及神州。这股“歪风”始自工人组织，而且越是处于底层的工人劲头越大。比如那些合同工、临时工就比国营企业的工人来得“疯狂”。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全红总”就是他们成立的，并到北京“闹事”。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叫停。除此，老知青（邢燕子那批）也闹得很欢。他们打着反官僚政治的旗帜，要求回城。这样的造反组织在清华园也有，就是我曾称之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红教工。红教工的主体是教师。这个群体在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主要的受害者。蒋校长主政清华时，虽然说过“一百单八将是清华的稳定因素”。可是他也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伤了多少人老知识分子的心啊。至于红教工的领头人陶德坚，那样一位心怀报效之心回国的年轻人，在祖国的遭际确实那样地悲催。他们的造反，争的不是经济的待遇，争的是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教工堪称文革群众政治的正能量。群众政治中群众是主体，最容易体现人民性！

（四）

研究清华文革绕不过蒯大富，钱文亦如此，而且着墨不少。或许由于钱先生身在燕园，故而在一些事实上略有差池，也难以体味蒯氏于清华园人那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但总体把握不错，褒贬得当，缘由也分析到位，使当事者有感触，后来人得深省。我之所以如此评价与切身经历有关。66年的老蒯与57年的笔者有类似之处：三年级，正值政治危险期，又都在明斋广播站这个是非之地干活。为什么说广播站是是非之地，这倒不是指后来两派

的你争我夺；而是这里汇集着校内校外的大事小情，多事之秋则更甚，犯点儿自由主义就惹祸。

多年以来我时不时琢磨，蒯派为什么反对工作组。联想到不久前群里“奉旨造反”与“原生态造反”的辩论，我意识到，就总体而言，右派与蒯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他们顶多也就是一群具有挑战权威，蔑视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挑战与蔑视起于意识上对现实的不满和性格上的倔强与争强好胜。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二者的诉求却全然不同呢？对此，钱文做了简练而精彩的回答，那就是他们在意识上的资源不同。

作为右派，大多数接受过民国时期的教育。如我说就读到初中二年级的重庆南开中学，开明人士张伯苓（梅贻琦也是他的学生）所建，教师中“海归”不少；西方价值观深入人心。我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对新民主主义一无所知，追求的是我党当时举得很高的自由民主的大旗。57年我们犯无政府主义惹的祸，多是对挂羊头卖狗肉的不满。然而蒯派在意识上的资源呢？是反右展览和“九评”学习的所得，是说了一百遍即成真理的阶级斗争天天讲……他们犯无政府主义，也不过在此基础上层层加码。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专制统治下，即便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的挑战权威和蔑视纪律，也有其积极意义。

造反派红卫兵早已成为过去，作为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份子，他们有显露本色时的青涩与任性，有身陷酱缸时的丑陋与张狂。他们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他们自我拷问良知值得称道，但不应被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人性！

（五）

团四之争也是研究清华文革绕不过的话题，对此钱文有一句精妙的引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不禁解颐后，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不过，阔气二字用在在这里，不仅指有形的，如财产；也指无形的，如政治地位。蒋校长治下，老四们多是孙群主笔下的优质生，或当红的“双肩挑”。到了蒯准校长治下，过去的差质生，或不得烟抽的干部，却成了清华园人财物中财与物的支配者。于是乎，老四一心想回到红光缭绕的殿堂；而老团则一意砸烂令他们一度贫气的黑庙。虽则自古有哲人之说“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加诸知识分子总觉俗气。而且,确实也有文革研究者如是说,“校园里的大字报绝大多数偏向于意识形态之争,或将批判对象的某些言行上纲上线,以本本上的教条为依据力证其非。在市民那里,他们对意识形态并没太多兴趣,他们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具体事例,诸如某领导欺男霸女,某官员挟私陷害,某小民冤案莫伸等等,他们诉求多有明显的利益指向。”

行文先就此打住——团四之争到底是不是,算不算利益之争?我这个局外人不敢妄言。还是接着钱先生的引文往下说。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后面还有半句话:“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钱先生为什么没有引用这后半句,或许是疏漏,或许认为不足道……可是,如若展现清华园全景式的群众政治,还真不能忽略。

清华园里哪些人是未曾阔气的?

(六)

清华园里未曾阔气的不乏其人。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以及入政治另册者及其它边缘人物……这类人有多少,假如沿用历来常用于统计坏人的百分率,如3-5%,则清华园也有成百上千之众呢,故而论及清华园文革群众政治不可不提。更有意义的是,这些人均属弱势群体。我国历来有“挖绝户的坟,踹寡妇的门”之说——欺负弱者最为人不齿。联系到08年哈佛大学生声援被解雇的来自海地的清洁工一事,看来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历来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指标。

就此衡量清华园里的群众政治,除初期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有过戴高帽游斗和“红八月”老兵的暴行外,直到派斗之前,造反派红卫兵称得起是文明之师。

现身说法。当时我们建工系有七名摘帽右派,除了侯在“红八月”中死于非命外,其余六人不仅得以全须全尾渡过浩劫,而且不无“成就”感。其中,倪参与建立二校门毛泽东塑像。何是班级演出队导演(何是57年从湖南招来的文艺特长生),我曾看见他们在二号楼露台排练忠字舞,有人称道何有刘庆棠风范。程是湖北人,72年我到武钢在江陵的“五

七干校”劳动，听当地人说，县里那几个来自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各个能说会道，其中就有程。陈是广东人，据说曾参与旗派在河源县设立分部。我自不甘寂寞，随尚未分裂的井冈山小分队先后到北京市衬衫厂和房管局所属半工半读技校闹革命，而且还都不是打杂的。至今尚保存有在衬衫厂与当权派个别谈话的记录和在技校主编的批判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的油印小刊物。侯的同班富，或因侯的暴死惊魂未定，哪儿也没去，一直以油墨和蜡纸为伴。

还又两位应该是属于边缘人物的老师令我记忆尤深。

朱永淑，我们的俄语教师。她曾是赴朝的英语翻译，因俄语教师不够而改了语种。当时我班有一位马姓同学生活极困难。我是班里的总干事，动员了两位调干生对他给予资助。朱老师得知后表示由她出资。我将此时汇报给团支书王万达，几天后万达告诉我不行。我一再追问为什么？万达期期艾艾地说，朱老师是基督徒，她这样做是要同我们争夺青年人。

黄昭度，教我们理论力学的老师，不苟言笑，眉心常蹙，总象是心事重重。淘气的同学不敬地称黄老师为“凡人不理”。其实黄老师对学生极其热情，极其关爱。多年后的文革中，我在荷花池员工食堂门前与黄老师不期而遇。那时正值隆冬，黄老师却眉目舒展，满面春风。再后来读过陶（德坚）林（贤光）二师的文字，读到众多的黄老师、朱老师在红教联是那样的如鱼得水，这才理解到，在别人的屋檐下讨生活，是多么的无奈。

是派斗终结了文明，是派斗使善意蒙羞。

就是这样一些从来被人伤害的人，刚刚舒展了几天眉心，就成了清华园里派斗刀俎下的鱼肉……我不能不老泪泫然！

就此，清华造反派红卫兵尽失文明；文革之恶也就尽显无遗了！

蒋南峰：读钱老论“群众政治”

1) 首先，关于“群众政治”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提法会使人联想到，在这个政治活

动中，“群众”或他们的中坚份子可以独立地左右这场政治活动的方向等等。但文革中，清华的史实并非如此，奉旨造反的各方都在琢磨最高层的意志以决定自己的方向。在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来“运动群众”这一点上，文革和反右（造右派的反）、大跃进（造老天爷的反）、四清（造农村基层干部的反）等运动并无实质差别，我认为都应该称为“运动政治”。但是，文革前期，刘还在通过官僚机构“层层分销”这种“运动政治”，而毛则采用了新的“直销方式”，以中央文革为直销总部，精心包装了五大领袖等一批“直销骨干”。

2) 钱文称：“在这样的背景下，蒯大富的政治意义和价值再一次突显出来，他领导的于此时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按这种说法，应该理解为：井冈山红卫兵是运动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产物，是“原生态”的产物，不是“人工培育”的。

但是，钱文也提到“朱成昭、韩爱晶都鼓励蒯大富成立一个组织。在他们的支持下，蒯大富集合了几十个同患难的‘蒯派’战友，于9月23日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地院、北航来了几百人，以壮声势。”

“以后的事情的发展，都是顺理成章的：10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这也是三司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大会，作了讲话。”“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红卫兵宣读‘誓词’。”“从此，蒯大富由清华走上全国文革政治舞台。社会上开始称他为‘蒯司令’，俨然成为全国红卫兵的领袖”。

然而，钱没有提及的是，据蔡新平的回忆：

“有一天朱成昭和我都在，她（指肖力）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肖力听后就说快把他找来。”“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我在清华臭的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

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组织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

“66年9月6号，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宣读誓词，但他那时还没有起拉队伍，还是光杆司令”“在正常情况下三司的成立大会是轮不到由蒯大富来宣读誓词的。肖力与蒯大富谈话后一再嘱咐朱成昭要帮蒯大富一把，不过仅仅是朱成昭个人的面子，也不见得就能把蒯大富送到三司成立大会去宣读誓词。如果如朱成昭对宋永毅说的那样，周总理有过扶持老蒯的意见，那分量就不一样了。我推测请蒯大富宣读誓词很可能就是中央文革，或者就是周总理本人的直接指示。”

以上资料说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和其它大多数红卫兵组织、甚至与同为清华造反红卫兵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一样。它绝不是自发地“应运而生”、之后自觉地的“以充当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派的‘铁拳头’为使命与追求”的“原生态”红卫兵，它不是“群众政治”的典型，而把它看作毛通过肖力和中央文革全力打造的“运动政治”的“直销员”似乎更为恰当。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它在清华校内能够“后来居上”，“力压群芳”，“一枝独秀”。由于是“人工培育”，先天不足而强行拔高，也就为此后清华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3) 如果按钱老“群众政治”之说，那么群众中出现不同意见、建立不同组织，就应该是正常的。但钱老文章中的调子仍然是把414的出现看作是分裂夺权，我认为这是他的自相矛盾之处，如同当年老蒯一样对414进行了过度的解读。下面这段话说的比较委婉：

相对于地质东方红在得知肖力身份后的表现，蒯最近的回忆连在地院见过肖力这样的“通天”大事都记不得了，对此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自称“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的蒯大富能够迅速走红？甚至两派分裂后还能有占多数的群众保持团派立场？我的体会是：许多人知道毛是支持蒯的，认为支持蒯就是支持毛。

许多老四来讲，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正因为毛支持蒯，蒯有可能成为掌权者、接班人，所以才要对蒯的错误零容忍。我认为蒯对414的出现有过度解读，一开始就认为414是来向他夺权的，正如蒯一跳出来，工作组就解读他是向党夺权来的一样。请注意：当初

蒯跳出来是提出过“夺权”的；而414除了武斗后期骂了几句“蒯匪”以外，从未提出过“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或向团派夺权的口号。你可以说这只是414头头的一种斗争策略，但是这至少说明了：老四的头头非常明白，提出这种口号只会使自己脱离自己的群众，老四的大部分群众仍然认可蒯与刘少奇的斗争。当年许多人曾幻想，如果蒯能够以正常的心态，正确对待414的出现，为全国做出样板，文革就能胜利收场了。只是蒯的应对越来越使人失望，才使清华的分裂一步步加深。因此，我希望今天更不要把414过度解读为分裂夺权而生。

孙毓星：

钱理群先生这篇新作以清华大学为典型事例从政治形态（模式）角度解析文革，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立意新颖逻辑严谨，特别是对“群众运动”——文革不同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最突出特点，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初读即很受启发，更多的还得继续品味。

钱先生指出，毛的策略是以“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模式来打击刘的“官僚政治”，为此就不得不“给群众以有限度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实行以“四大”为标志的“大民主”，放手让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尽管后来因种种原因仍然回归于“官僚政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终归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笔。

作为一个学者，钱先生显然涉猎过许多历史资料，最后选中清华作典型，并以三本书提供的素材为主来讲清华、论文革。可以想见，其间必然经过了比较、鉴别、去伪存真等一系列研究过程。这是一种治学方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正是我们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学人所应借鉴的。本群邀请多位外校学者和友人参加，他们从第三者的角度看清华文革可能更客观，而对整个文革的认识将会更全面更深刻。这样一来，也是在开拓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理论高度，推进反思的深度。

文革历时十年，形势不断变化发展，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或理论）来概括，不同的“群众”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他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判断是大体不变的。

钱先生文中对此已有所描述，如能再细化一些当然更好。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有多种不同的侧面，比如有奉旨造反的一面，又有自己的深层次的利益诉求，所以，对上面的旨也往往会各取所需。文革中的群众政治不同以往，其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全民的思想解放。

【重点探讨】

“群众政治”是钱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也是我们热议的一个焦点。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以外，还有下面一些帖子对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平和、理性的讨论。

朗钧（外校朋友、学者）：

钱文最大的问题是“群众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拔高文革。1957之后还允许“群众政治”出现？尤其是文革？

“群众政治”提法并无新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表达。而“人民文革”说是从“两个文革”说中推演出来的。其倡导者是王希哲、杨小凯、刘国凯，还有郑义。

判断“群众政治”在文革中是否独立存在过，主要看其政恰纲领或口号是否有别于“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的纲领和口号。以清华为例，老蒯团派的政治诉求是“彻底砸烂”，而这个“彻底砸烂”源于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更早的表达是在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虽然刘（涛）贺（鹏飞）红卫兵与蒯红卫兵势如水火，但如果刘、贺红卫兵掌权，也跳不出“彻底砸烂”的框架。1971年迟群、谢静宜搞的“两个估计”就是“彻底砸烂”的官方表述。“两个估计”的本质就是将毛搞文革的初衷之一落实到实处。（钱文没有提及“两个估计”与“彻底砸烂”间的关系，或许是疏漏） 仅此上述一例可见，在清华文革中，“群众运动”是有的，但“群

众政治”是莫须有的。

曹嘉庚：

文革是那个体制下党内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没有群众什么事，群众只是被利用和被运动的一方，根本不能自主，所以不能成为第三方。

李海文（北大校友、党史专家）：

钱文涉及到理论，而不仅是一般历史叙述。文革前是否是官僚政治，文中对此没有论述。这涉及到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否正确。也就是对文革是肯定还是否定。另外也没讲造反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人民幸福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既然涉及理论，就要讲出其所以然。写文章在逻辑上要自圆其说。这是我一直不明白的问题。

理论成为完整的体系才称得上理论。其基础是概念，并对概念有确定的，正确的定义。如果拿几个名词套用，解释历史。学术界这个情况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请教：什么是群众政治？建国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不是？美国的工会参与的政治是不是？在野的国民党是不是？政党政治与群众政治有无区别？……

朗钧：

问的好。似乎叫“红卫兵政治”或“造反派政治”更贴切些。

郁吉仁：

毛林都强调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在共产党专政条件，怎么还有别的谈得上的政治？毛林不允许，客观也不存在。政治就是制定政策治理社会。红卫兵，造反派有这权吗？所从钱文三政治说是站不住脚的。

朗钧：

钱先生创新出一个中性名词“群众政治”。这名词似乎与所述内容不大相符。因为对“政治”的常规理解是“各种团体进行决策的过程”。一般而言，是指政党的决策过程。钱先生文章的表述是强调团派和四派的活动具有了“团体决策”的性质，所以具有了“政治”的特征，所以被唤作“群众政治”。但是“群众”二字明显是“团体”二字之反意。所以建

议钱先生改称“红卫兵政治”或“造反派政治”。因为团派，或四派，或刘、贺红卫兵都是“团体”，他们的决策过程似可被称为“政治”。

张雪梅：

从我切身体会，在清华的文革中没有“群众”的真正地位，更谈不上“群众政治”。用“团体政治”也不合适。

朗钧：

如果一定要将群众组织分类。可能以拥蒯和反蒯来划分更靠谱些。刘、贺是反蒯的。四一四也是反蒯的（其中很多人以前是拥蒯的）。七二七也是要废蒯。

前期刘、贺反蒯有较明确的中央背景。后期四一四反蒯似乎只有思潮背景，即那条“十七年红线主导论”。

刘尚培：

朗钧以蒯排队似不妥，特别是把刘、贺与414并提。

朗钧：

或许不妥。但以蒯为线确实可以贯穿清华文革史。其他人都不行。钱先生文章标题是“群众政治”，所以我想起了老蒯这条可以连带刘、贺和四一四的主线。

程从从：

对钱文有两点疑问：1、我怎么看不到三股政治力量（或三根线）？我只看到毛、刘所代表的两股力量在缠斗，群众政治能作为第三股吗？2、团四之争怎么是毛、刘两股力量之争？即独裁者与官僚体制之争。虽我无能力分析，但深层次原因不会如此泾渭分明。

关于疑问1，谈点个人看法。

群众政治是毛、刘缠斗的工具，毛是玩弄群众政治的高手，在中国政坛无人可以企及。群众政治是无穷放大毛力量的放大器，刘少奇等官僚不堪一击。群众政治是毛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文革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官僚政治一统天下，文革中毛利用群众政治摧垮了官僚政治，确立其无与伦比的个人独裁统治。

但在毛式的群众政治中，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没有自主权，群众是戴着紧箍咒的。或者说，在毛的操控下，群众政治不过是如来佛手心中的群舞，任由毛掌控，收放自如，翻手便是一座镇压群舞者的五指山。因此，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不过是“奉旨造反”，是毛式运动群众前提下的“群众运动”。

毛之所以能利用群众政治达到其目的，在于文革前的愚民教育和造神运动。文革中一群“愚民”在神的教唆下发动对刘少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攻击，形成了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的毛氏独裁。

真正的群众政治，应该是摆脱独裁者左右，并具有完全自主权和独立政治诉求的群众活动。

张存和：

群众政治可以说是强人政治的初级阶段。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及。

每当政治权力出现局部真空的情况下会出现群众政治，历朝历代的末期便是如此。也有特例：作为党魁的毛泽东在失去党内高层的多数，而刻意发动群众政治。

群众政治的初期“遍地英雄下夕烟”，群龙无首，随着兼并或联合，出现领袖人物，群众政治或被“纳入正轨”，或头头称王称霸，转化为新的强人政治。否则的话，第三条出路必定是昙花一现。

历史告诉我们，群众政治没有转化成民主政治的可能。只有成熟的强人政治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才会自上而下有序地转化为民主政治。否则，就只能一直在强人政治的泥淖里滚。

清华文革一度出现权力真空，群众组织蜂拥而起，大小头目谁也不服谁。中央文革相中了蒯大富，井冈山红卫兵一夜暴起。于是蒯大富也要向强人政治转化，却不料沈如槐、孙怒涛不服，于是清华大学继续在“群众政治”泥淖中滚。直至真的强人政治——8341部队从天而降。

王大定：

不少人一片叫好，我对钱的文章不那么看好。这位没参加过清华文革的先生侈谈清华，

造出了“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群众政治”三个政治说法，说这三个政治在清华决斗。

关于“群众政治”我前面已经说了，是没有的。又翻开了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66页，写到7月7日马力见蒯大富。我认为就是一个暗示。写到7月22日王力关峰看蒯大富（没写二人说了什么）。我认为就是得到指使，被毛拴住了。

说“独裁政治”，刘少奇不是独裁政治吗？邓不是独裁政治吗？那个官僚不独裁？蒋南翔不独裁吗？

说“官僚政治”，毛是头，是第一个，是他建立了官位制，在他的指挥下官僚们压迫和掠夺百姓。所以，区分成“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是无稽之谈。

其实文革就是毛要把刘搞下去的一场恶斗。毛刘即有权力之争，也有路线之争。权力之争，要建立家天下，刘的第二把交椅早晚要撤，是时候了，再不撤，怕被刘拱倒，传不成家人了。路线之争，例如公私合营的进度有分歧，对社员的控制程度有分歧。

为什么要同时打倒那么多的干部？我认为，毛是报复。七千人大会毛做了检查，丢了脸，看出多数干部认同刘。毛要重新建一个队伍（不过，最后没成功）。

毛为什么把清华作为第一战场？因为工作组整学生可以作为把柄，蒯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

比较钱的文章和杨继绳学长的文章（或谈话），钱没有杨学长的深度，没有杨学长叙述的明白。

钱的文章说了“三股力量”。其实，“平民”的力量，后来转化成了争权夺利，清华的团四，其实是两派争权。各地造反派无不分裂，都是争权。这里面没有出一个有政治家的人物。

吴学民：

钱文从三种政治的角力来解析全国和清华文革确有独到之处，使人们对复杂的文革的认识更为清晰。但三种政治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马列主义。无论哪一方都宣称忠于这个主义。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涌现出一股怀疑及否定这个主义的政治，而原有的那三种

政治依然存在，分别以毛左、民粹及特色派的面目示人。且他们无一例外，都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宪政。

提出“群众政治”是钱文的精华所在。钱并没有对群众政治给予一个确定的价值判定，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力量出现。群众肯定是指各种利益诉求的集合，文革前两年之所以是大乱，就是因为群众被允许自行成立组织登上政治舞台，这是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

另两种政治的诉求似乎很清楚，但也很难给出明确的价值判定。毛的诉求是谋求他的绝对统治地位，但他的理论至今还有许多追随者；官僚政治也不是一无是处，实际上，日常的国家治理正是要依靠一批训练有素的官僚。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三种政治良性互动，而不会产生文革的灾难。

孙怒涛：也谈群众政治

群众政治是文革前从来没有的，文革中特有的一种政治形态。它有几个重要特征：

1、毛恩准红卫兵组织合法是群众政治的发端。以往，凡是体制外的组织，哪怕是个读书小组，都有可能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自毛给清华附中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以后，各种红卫兵，各种战斗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群众组织奉旨成立，群众政治也赖此开始。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往没有的。

2、如果说，独裁政治、官僚政治都不是铁板一块，时有内讧、穿越和交叉，群众政治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目标，不是一支统一的势力。实际上，群众政治都是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在幕后指使，当后台，并依附于这两者。所以群众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分派的。主要是两派：倾向于独裁政治的造反派、激进派，倾向于官僚政治的保守派、温和派（在清华就是88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89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后来是团派和四派）。所谓群众政治，只是从官与民或上层与下层的意义而言。群众政治是民间的、下层的政治，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是官方的、上层的政治。群众组织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对立的程度几乎达到国共内战的惨烈，这是文革前从来没有的。

3、独裁政治发起群众政治的主要目的是组织自己的政治势力（红卫兵）向顽固而深

厚的官僚政治（各级党政组织）发起攻击，进而夺权。以往的政治，都是官官的内斗和官民的上下斗，显得比较“单调”。而文革则是官官在上层厮杀，民民在下层混战。“民”不是独立的统一的势力，是分成两派助各自的“官”。这就是文革的大图像。一党统治下，全国范围内，“自己人”向“自己人”夺权，这也是以往从来没有的。

4、群众一旦组织起来，除了对独裁政治依赖，为独裁政治所驱使的主要一面以外，还有浮肿膨胀不听使唤的（如团派），打着造反派旗号实则是在帮官僚政治的（如414）。甚至，还有趁机争取自己合理的经济政治权益的（如各地的临时工组织，清华的红教联）。而后者，是独裁政治、官僚政治都不能容忍的。这种异化现象也是以往所没有出现过的。

文革是政治运动，是群众运动，也是运动群众。

正因为发生在下层群众中的政治有上述这些与以往的政治运动明显不同的特点，我认为，把文革中群众的政治作为称之为群众政治是有道理的。

727事件，标志着造反派的覆灭，红卫兵运动的衰亡，也是群众政治的终结。以后的文革，只有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继续缠斗，面上的“群众政治”与以往的政治运动已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剩下的只是在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联手下被一次次地清算，成为暗流，或可成为公民政治的涓涓溪流？

沈昆：

文革时期的群众（大众）政治，就是文革中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实行自我管理，并通过多种途径对权力当局发生影响，同时也接受权力当局的影响甚至驱使而完成一些权利当局想做而不便做的事。

当然，由于当局多年对大众的思想灌输，以及大众在思想意识、政治取向、和文化传统上的惯性，也由于权力当局的绝对强大，文革中的群众政治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但不能因此自我菲薄，更不应不切实际地过于苛求。

中国的群众政治显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经历漫长、渐进的发展过程。这固然是由于权力当局的强大与无所不在，同样也由于大众自身需要完成第二次启蒙以克

服几十年来在中共管控下形成政治、思想惯性以及几千年来的文化惯性。

危启正:

说钱先生的文章好，主要还因为他对文革做了理论探讨，他提出了“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群众政治”的说法，阐述了三者的互动关系。他在文章中对他提出的三种“政治”名词做出了或定义或释义或阐述。在他的这个基础上看他以三个政治及其互动的理论解说全国的包括清华的文革运动，他解说得大体上是不错的。

对于钱先生的文章，我的一个不同的观点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政权，他要建立的是在他牢牢地稳稳地独裁之下的组织更加严密，更加无思想有效率、对他言听计从的专政政权。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只是应他的短期需要才被策动出来允许存在的，在短暂的使命完成了以后，当然就必须消失。

在文革之前，党、政、军，也基本上是毛泽东控制下的“官僚政治”。传说中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六十年代早、中期间或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对毛泽东的合理抵制，并没有使当时的“官僚政治”与毛泽东对立的意图，更没有成为事实。从1949年到当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恒稳地存在着的是对毛泽东（当然，以及他代表的共产党）的服从和崇拜、神话宣教，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确凿无疑的以毛为主制造的大灾难时期皆如此。

【精彩点评】

张从（北大校友）:

钱先生是北大教授，为何写清华而不写北大文革？我以为有两点原因，一是清华文革确实有典型性，两个司令部集中斗争，造反派掌权后走向反面，武斗不止导致高层出手收拾，728成为文革转折点；二是清华文革研究比较深入，资料相对较丰富，钱先生读了蒯、孙、唐三人著作即可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来。钱先生论北大已出版几部专著，但基本都未

涉及文革，亦为憾事。

钱先生文革前已从北大去贵州，文革后考研回北大，未亲历北大文革，北大文革馆藏资料不让看，研究成果少，也可能是他未写北大文革的原因之一。我已将部分资料发给钱先生，期望他能写出大作。

文革时群众空隙大，可以不经批准贴大字报，办小报，广播台，四处串联，成立组织。但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的也最多。这种机会是历史上少有的特殊现象，值得研究。

在文革前二年，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规模，内容和形式应该是比较多的，不只在清华，全国皆如此，例如写大字报，组织战斗队，上街游行，出小报，广播，辩论会，外出串联，等等，可以说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点不能否认。当然用群众政治这个词是否恰当，还可以讨论，至少当时群众参与了政治，参与度很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虽然有些是被利用了。

张比：

钱先生的文章读了三遍。他参考了大量文献，写作上表现扎实的功力，而研究方法也非常先进。他正因是局外人，所以很客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他对专制、官僚、民粹的分析，提供了研究文革的新思路。

对团、四两派的分析，参考了唐少杰先生的文章《一叶知秋》，但更从利益诉求这一角度剖析，有较强说服力。总之，清华文革之矛盾，演变为武斗，不是偶然的，要从十七年去寻找答案。

朱德瑜（地质校友）：

此问题得深入研究

阎淮：

钱文确有新意深意，浅评如下：

独裁政治，极权社会普世常态；

官僚政治，现代社会管理必然；

群众政治，从无似为运动政治。

政治有本意与延意，可狭义或广义；如办公室政治，公司政治。

我仍坚持：只有中国能文革，毛确具异于其他独裁者的，反官僚的极端民粹理想。

蔡新平（地质校友）：

“空隙”可以理解为自由度增加，控制放松，压力减小。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主活动自由量增强，言论行动相对的自由，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巨大的政治势力。这有可能导致政权的崩溃。因此现今的维稳就是不断压缩自由空间，减少“空隙”。

吕述祖：

草草浏览了钱先生的文章，非常佩服。一个非清华人把清华的文革梳理得如此清晰，实在是不容易。需要仔细读才能评论。

钱久业：

同感，确实把清华的文革梳理得如此清晰，非同一般！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深思。

【纠错指正】

梁颂辉：

钱文理论剖析较深入，值得一读。有个细节商讨一下：文中说《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印了50万册。据我所知，兵团总部编印的铅印本并未付印，社会上流传的油印本倒有好几个版本，文章不全，错漏也多，外地造反派翻印的我也没见到铅印的（因文革时用纸极为紧张，需中央文革批），靠油印的不可能达到50万册。68年时，兵团总部准备铅印，正在排版，68年6、7月，我参与了部分文章的校对，未校完，7.27工宣队进校，就流产了。

叶志江指出：我记得《牛虻》的作者是伏尼契，不是钱理群文中的伏契克，后者是《绞

刑架下的报告》作者。

米鹤都（外校朋友、学者、蒯大富口述史《岁月流沙》作者）指出：蒯的口述史原题拟为“潮起潮落”，但后发现有多重名的，正式发表时改名为《岁月流沙》，载《回忆与反思》第一册。

孙毓星指出：关于周总理接见蒯大富等4人，不是7月31日，而是8月1日凌晨及晚间各一次，在周恩来的年谱上有记载，孙怒涛主编的《历史 拒绝遗忘》这套文集里专门厘清了此事。另外，此前的30日，周已找过工作组和两批学生谈话（见年谱），应该是刘涛、贺鹏飞等（工作组指定的文革筹委会）和雷蓉、王小平他们（包括杨继绳等批评工作组的师生），此后才找了蒯等人（当然其后又找过不少人谈话）。这正表现出周处事的特点：符合内外有别、先内后外的原则，周全精细，滴水不漏。8月1日晚间在大会堂第二次接见蒯等人当然不是因为“还没谈完”，而是找来两位开会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江渭清和谭启龙作旁证人，一起听蒯告御状。这样既实现了毛的意图，也不会让刘邓挑出毛病。

文中多处引用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几位校友的文章，拙作《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也在其内。在第49页第三段引用了我的一段话，前边写道，“正如一位414的成员在回忆中所说……”，但我是团派，不是“414的成员”。可能钱先生觉得参与写文章帮助孙怒涛成书的10余人应该都是414一派的，这是误会，其中沈昆和我（孙耘）都是“铁杆”老团，李仕林几位则是主张大联合的“第三种力量”，都不属于414派。两派在一起共同反思，正是孙怒涛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标示了清华多年来文革反思的重要成果。

廖凯贤指出：武汉揪王力的是七二0事件，错写成五二0了。

孙怒涛将上面几位的指错及自己发现的差错，列表如下：

- 1、P2，第2行，“蒯大富《潮起潮落》”应为“蒯大富口述史《岁月流沙》”。
- 2、P11，倒第5行，“整死了两个人”应为“整死了一个人”。
- 3、P12，倒第5行，“7月31日”应为“8月1日”。
- 4、P16，第8行，“少数派赞”应为“少数赞”。

- 5、P22, 第13行, “五二0事件”应为“七二0事件”
- 6、P26, 第10行, “伏契克”应为“伏尼契”。
- 7、P33, 倒第2行, “4月4日”应为“4月14日”。
- 8、P33, 倒第1行, “5月28日”应为“5月29日”。
- 9、P44, 第11行, “1月3日”应为“1月4日”。
- 10、P49, 倒第6行, “414的成员”应为“团派的成员”。
- 11、P55, 注2, “路小宝”应为“陆小宝”。
- 12、P59, 第13行, “四二四”应为“四二二”。

万润南贴出冯胜平的《文革人》

<http://www.jintian.net/today/html/80/n-67580.html>

朗钧贴出徐贲的《群众和“人民文革”》

<http://cul.sohu.com/20150910/n420846742.shtml>

吴学民贴出朱学勤的《造反派, 真的反了吗》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785.html>

他们贴出这些转帖与钱文比较, 供大家参考。

【钱老回应】

本次讨论虽然钱先生没有入群与大家互动, 令人欣喜的是, 他与大家也有交流。在讨论开始时, 钱先生发来一封邮件——

我当然愿意和清华同学讨论, 但我没有微信, 也不会用, 就无法进行网上讨论了。

清华这一篇是我快要完稿的关于文革的一本书中的一篇, 是作为大学生红卫兵运动的个案来写的。本想选北大作典型, 也看了些材料, 最后选了清华, 是因为清华有414思潮,

更有代表性，而且清华人对文革的反思，似乎比北大更深刻。

在我们对钱文热议了一星期后，我整理了一篇《清华校友热议钱理群先生的“群众政治”一文（初稿）》寄给钱先生，并希望他写几句话作为回应。没想到钱先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写了长文回应，更深一步地详细阐述了关于群众政治的思想（如下）。钱先生对清华校友认真、热情、谦虚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对《清华校友的热议》的回应

钱理群

没有想到拙作《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群众政治》能够引起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清华校友的热议，你们如此认真的阅读，讨论，校正了我的许多错误，提出的问题更引发了我的思考，我真的非常感动和感谢。说实在话，没有你们的那么多翔实的回忆，深入的反思，我的这篇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现在你们的热议，更是对我的写作的一种参与和支持。这背后有经历了文革的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我写这篇文章，以及关于文革的这本书（书名为《燭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其实就是对自己的那一段生命，以及自己亲历的共和国这一段历史作一个交代。我想你们的关心也是基于此：正是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的心的连在一起了。在文革中我虽不在清华，但也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而且是一个始终参与其间的激进派。我写清华的文革，其实是把自己对文革的生命体验、思考、反省投入其中的。

我读你们的热议，还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们一家人都与清华有关：我的父亲，两个哥哥，一个侄子，一个外甥，都是清华人。我也曾应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但没有正式上过课，是挂名的）。我一直同时关注北大与清华两个学校的发展，在和北大学生交

谈中，经常谈到两个学校校风的比较，希望北大人多多学习清华人的务实，认真，以达到一种良性的互补。这一次热议，又让我感到了清华人的较真劲儿。我研究大学生红卫兵运动选择清华作个案，原因之一就是清华人对文革的反思比较深刻，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我常说，学理工科的，一旦关注到文科问题，常超过专门学文的。这一次也可以说是北夫人与清华人的一次交流与合作。应该说，清华与北大是全国文革的两大重镇，希望在文革研究上，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合作。

下面，就朋友们热议中谈及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想法。

1，你们在热议中谈到，“群众政治是文革中特有的政治形态”。这也是我的看法。群众政治应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民间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二是独立性。正如许多朋友所说，文革中的群众政治对毛泽东的独裁政治是有一种依附性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同时是不受单位和地方党组织控制的，并且是以反对官僚政治为自己的使命与存在价值的，这样，它又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点，只要放在共和国历史上看，就十分清楚。文革前的群众运动，包括一些朋友提到的反右运动，都是在单位和地方党委直接控制下的，在1956年鸣放期间，党委曾按毛泽东指示，放任群众鸣放，但那是一种“阳谋”，结果，所有鸣放期间的民间刊物，社团，自由论坛，都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铁证。唯有文革那两年“历史的缝隙”里，群众的结社、出版、言论，都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然，还要受独裁政治的制约）。而在此后，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不受单位、地方党组织控制的民间社团、刊物、论坛……都不允许存在，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铁的事实。从文革中群众政治对独裁政治的依附性这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完整、不健全的跛脚的群众政治，与我们期待的完全独立的群众政治（也可以叫“公民政治”）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但它毕竟是向理想的真正的群众政治迈出了第一步，而且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有了它的不可忽视与抹杀的价值。

2，文革期间，这样的不受地方官僚政治控制的群众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显然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我看来，毛泽东倡导、支持群众政治，不仅是他打击官僚政治的需

要，也还有他自己的理念与理想，这就是有朋友在热议里谈到的“毛异于其他独裁者的反官僚的极端民粹思想”。这也是我在文章里强调的，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是要进行一场“扫荡中间阶层（包括党官僚和知识分子），实行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对接”的实验。他在一定程度上给群众以六大自由，提倡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强调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管理学校”也是这样的理念的体现），都是他这一试验的具体措施。这些试验，有的在文革中后期就放弃了（如六大自由，巴黎公社原则），有的坚持下来（如工宣队），实践的结果，都给民族带来灾难。这里的历史教训是应该正视与认真总结的；是否内含着某种合理因素，则是可以讨论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文革中的群众政治，背后确实有一个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是不必回避的。

3，我们在强调文革群众政治与毛泽东独裁政治的依附性时，也不要把它绝对化与简单化。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指出的，“群众在拥戴毛泽东的同时，也裹挟了毛泽东。在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时，也会曲解、修正、放大或缩小毛泽东的原意，产生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甚至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毛泽东的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总体是统一的，也会有偏差，甚至背离；毛泽东的控制总体有效，也会打折扣，甚至无效；总体可控，也会失控”。

我想强调的是，群众政治的发展是有自己的逻辑的，特别是在群众获得独立思考的权利，就有可能超越毛泽东的底线。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提倡怀疑精神，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怀疑他自己，但把怀疑精神坚持到底，就必然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毛泽东和他绝对要维护的一党专政的体制本身，这就是在造反派中出现的“极左派”的异端思潮，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等就提出了根本砸烂旧国家机器，重新建党、建军的主张。尽管群众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清华的激进派和温和派都不予支持（蒯大富的“砸烂论”与杨曦光的“彻底砸烂论”是根本不同的），与之保持了距离，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来，却是一个极大威胁，是绝不允许的。这其实是毛泽东要在1968年7月28日宣布结束群众政治的最根本的原因：他担心群众政治失控后发展成异端政治力量，如果掌握了武装，就更不可收拾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取得了政治合作的新基

础。

事实上，文革群众政治也没有因为造反派组织停止活动而结束，而发展成了民间思想运动，形成了民间异端思潮。其实这也是我的文革研究的真正兴趣所在。在我看来，在文革后期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也是一种群众政治的新形态：它也有“沙龙”式的更为松散的组织形态。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在所参加的造反派组织被镇压以后，就聚集了一批年轻人，进行思想的探索，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的更加重大的政治问题，自觉地为在我们看来必然到来的“巨大政治变动”作思想、理论、组织上的准备。这样的群众政治，就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尽管我们在思想上仍然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和反叛性。它继续反对官僚政治，也为毛泽东的独裁政治所不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四五运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民间异端思想基础上的群众政治的反抗运动，以后的“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间反抗运动其实也是文革后期的群众政治（民间思想运动）的一个延续。八九年政治风波中出现的高自联、工自联更是发展到了自觉的更为独立的阶段。这中间的历史线索是清晰可见的。从这一角度上看，群众政治的概念又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4，因此，我同意热议中有的朋友提出的群众政治是一种“团体政治”的意见，它主要以民间社团的形态出现，有的就是以独立刊物为中心，聚集着相对稳定的作者、读者，与政党政治不同，有更大的包容度，松散性，没有那样严明的组织纪律。它推动的是民间思想运动，社会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参与。它一般没有政党式的明确的政治纲领，但也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我看来，这样的建立在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和独立基础上的群众政治，它既对政党政治、国家政治提供社会支持，民意基础，更是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形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会出现群众政治的各种新模式，比如网络的出现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创造了全新的网络政治。这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群众政治新形式，还有待观察与实践。

5，在我的认识与构想里，对文革中的群众政治的研究，是一个历史溯源的工作，不

仅要肯定其最初不完整、不成熟形态的历史合理性，更要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其实，我的文章的重点，就在揭示文革群众政治的局限与先天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有四：其一是对独裁政治的依附性。这不仅表现在群众政治的存在前提六大自由是毛泽东提供又收回的，更是其政治理念与思维、行为、情感、心理方式都是毛式的，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中形成的，群众政治就难免激进派被独裁政治同化，温和派被官僚政治渗透的命运。其二，文革的群众政治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且都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三，文革群众政治是一种暴力政治，不仅对自己的革命对象实施专政，对内部必然出现的不同派别（这本是群众政治的基本特征）也行使“镇压之权”，导致两派之间无休止的武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四，支撑群众政治的理想、信念中的革命至上，斗争至上，二元对立的绝对思维，不知妥协的战斗精神，等等，也都产生严重后果。这些反省很多都是受到清华同学的启发，也有我自己的文革反思。坦白地说，写下并强调这些，显然是因为发现当年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这些谬误，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政治里，仍然发生着作用。我在一条注释里，忍不住表达了我的隐忧，不知道诸位注意到没有。

6，不仅我们讨论的这种反抗官僚政治，又依附于独裁政治的群众政治是文革特有的政治形态，而且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分离与对立，也是文革特有的政治形态。我同意有的朋友提出的“文革前党、政、军基本上是毛泽东控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判断。我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一书里，提出文革前最典型、完整的官僚政治形态，是1957年反右以后建立、完善的“党统领一切”的“五七体制”，就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构建的。但在大跃进导致大灾荒以后，党内就逐渐出现、形成了两大派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刘少奇为首的稳健派，但还是党内的派别之争，总体上依然是服从于毛泽东的。我在这本书里对这两派斗争过程有详尽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1964年四清运动提出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即党官僚）为革命对象，到1965年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提出“两个司令部”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才把党内的派别斗争变成国家政治中的

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两大政治势力公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就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毛泽东倡导与支持了群众政治力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按，主要指官僚政治），这才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独裁政治、官僚政治与群众政治”三大政治势力活跃在文革政治舞台上的格局。到文革中期，群众政治退出；到文革结束，毛泽东支持的四人帮垮台，也宣告毛泽东独裁政治的失败，官僚政治的胜利。以后的中国政治基本上是官僚政治主导，毛泽东的影响始终存在，并培育着新的独裁政治。

7，最后要说的是，我提出“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群众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的概念，对我的研究对象——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派运动，我认为是有解释力的，除了这篇《从清华红卫兵运动看文革群众运动》之外，还写了一篇《工人造反运动的兴衰沉浮》。我知道它的解释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文革实在太复杂，很难只用一种阐释模式，就可以把文革讲清楚。应该从多个角度，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的。希望这一次对拙作的讨论，能够引发出更多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实践。

谢谢诸位，特别是组织热议并作整理的孙怒涛先生。■

2016年10月30日——31日

（收录在这里的文字仅是讨论的二分之一，还有一半因篇幅关系没有选用。特此说明。）

【评论】

台前与幕后

——北京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简评

赵惠中

许多人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有两年,即从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开始,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为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在阅读了大量文革亲历者的文章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这两年所谓的群众运动,完全是由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操纵的,大多数人盲目紧跟的“运动群众”。

因为个人视野的局限性,不可能对此作全面的正确的论述,只能从亲身感受与了解的部分事件真相中谈些肤浅的认识。

一、五大学生领袖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他们能成为“领袖”肯定有其本人独特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学校(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与北京地质学院)的政治“星位”。选择这“五大学生领袖”,犹如围棋高手的高明“布局”,毛泽东由此将文革这盘看似“无序”的棋局被纳入了“有序”的轨道。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到刘少奇,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其使用的语言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为刘少奇当时的职位是党中央副主席与国家主席,按正常途径要撤他的职必须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毛泽东深知并无胜算,于是就搞了个怪招——文化大革命。

首先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获得了文革的领导权。紧接着从下面寻找突破口，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就是他们找到的突破口。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的，贴出后在北大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他们还遭到了李雪峰的责问，也遭到了校党委的打压，要求他们作检查。但是他们的大字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他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是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于是文革的熊熊烈火在全国被点燃了。聂元梓随之横空出世了，成了文革第一人。

谭厚兰也不是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而是由中央文革内定的。就像现在的各级领导以及人大代表由上级指定的一样。谭厚兰是北师大61级的调干生，在1966年6月1日前就被借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忙”。在事先获得内幕信息的前提下，于6月2日早晨谭厚兰和历史系同在《红旗》“帮忙”的三位同学从《红旗》杀回学校，在北饭厅东墙上贴了第一张炮轰北师大校党委的大字报，抢了打倒校党委的头功。

但是谭厚兰并无多少主见，政治嗅觉并不十分灵敏。最佳例证是在“6·20”高树奎等同学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之后，她不但不跟进，反而跟着工作组一起打压这些师生。经过幕后人林杰的教训，她才在“6·23”重新贴大字报“反戈一击”，维持了“反工作组”的身份，敲定了“北师大第一人”的地位。从此以后谭厚兰认定了“紧跟林杰就是紧跟中央文革”。

为了牢牢控制北师大，1966年7月27日晚中央文革亲临北师大撤销了工作组。康生还把林杰介绍给全体师生：“你们看，我把林杰带来了，（鼓掌）同学们！林杰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热烈鼓掌）这是个好学生，你们的一个好同学！（热烈鼓掌）但是被孙友渔别有用心地说‘林杰支持右派学生！’还有人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还有个后台老板是我呢！’”从此以后，林杰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谭厚兰的军师，成

了北师大文革的幕后操纵者。

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的成名与谭厚兰不同，他们是先苦斗后再获得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早在1966年6月16日就贴了一份《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后来又多次与工作组组长叶林以及薄一波、贺鹏飞等交锋，最后被单独隔离，被迫绝食抗议。直到7月22日才有王力、关锋单独接见他（在6天前北师大孙友渔已被撤销工作组组长），7月31日凌晨与晚上，周恩来总理分两次共用了六小时听取蒯大富汇报清华文革情况。8月4日周总理带着100多中央委员到清华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周总理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这不仅奠定了蒯大富为清华大学学生领袖的地位，而且确立了他仅次于聂元梓的特殊地位。

韩爱晶在1966年8月25日带了100多人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揪回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在国防科委静坐的28个昼夜显示了韩爱晶的领导才能，他因此成了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

北京地质学院最早的造反派领袖是水文系62级学生朱成昭。文革初期他和同学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副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被逼上梁山，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

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他自然地成了“三司”的第一把手。

对这些造反派红卫兵，中共中央的各派当时都想要利用。毛泽东自7月起便派他的女儿肖力（李讷）任自己的联络员；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来地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公社接受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此事的详情后文另述）彭德怀被抓后与地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交流，地院许多同学都接受了彭德怀的观点，认为整彭德怀整错了。因为朱成昭的安徽老家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对彭一直持同情态度。彭德怀当时有一套绝密材料，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朱成昭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整彭是错误的。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但是王大宾后来却偷偷向中央文革汇报了，导致了朱成昭的下台与王大宾的上位。“五大学生领袖”各人的成名途径大同小异，聂元梓与蒯大富还分别有“倒谢（富治）”、“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反康（生）”的壮举，但是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传声筒，是被他们利用的工具，充当了他们的急先锋，在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而最终都成了毛文革的可怜的替罪羊。

二. 在“工作组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之争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毛泽东到杭州去了，文革的事交给刘少奇负责处理。沿用以前的习惯，刘少奇想到的是派工作组，196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共同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组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据参加这次碰头会的刘志坚回忆，在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后，周恩来还当场到隔壁房间用电话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

在毛泽东同意后，陈伯达于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于当晚10点多钟进驻北京大学。这一消息于6月3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工作组原来是以华北局名义派出的，电讯稿中改称“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毛泽东看了这条电讯稿并表示同意。6月3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和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运动中要“注意内外有别”等八点意见，并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团中央、组织部组织人力帮助。”会议同意了李雪峰的意见。6月3日、4日，北京新市委开始向一些学校派出工作组。

自从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北京许多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各学校的领导机构这时事实上已陷于瘫痪，无法行使领导职能。鉴于无政府状态急剧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从6月5日起，北京市委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从6月5日至6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抽调，中学的由团中央抽调。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也纷纷仿效北京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在此期间，鉴于文艺战线“问题严重”，由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派出了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总政治部抽调30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组，是经林彪同意的。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派出了工作组。期间毛泽东虽然在外地，但中央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并不断有各种动态材料报送给他，

派工作组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一清二楚：当时，谁都没有指出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

与此同时，一批高干子弟利用信息优势抢先在本单位贴党组织领导的大字报，像清华的刘涛与贺鹏飞、北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宋彬彬、邓榕、北京四中的孔丹、北京八中的陈小鲁等等。有了这些政治资本后他们便纷纷进入了学校文革的领导岗位。刘少奇还把王光美安排在清华大学工作组担任顾问，便于他掌握情况领导运动。平心而论，这些做法都在刘少奇的职责范围内，只是利用妻、女当先锋有点“开后门”性质。此时的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与发展与毛泽东是不一致的，但他不敢硬顶，只能暗抗。

刘少奇并非认为整个北京都是“黑帮”，他也不想彻底摧毁原来的组织系统，所以工作组到校后立即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让他们与学生隔离开来。他的这些做法明显的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宣传的精神有别，引起了学生的警觉与不满。6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采取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等行动。当晚，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他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今天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号召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并宣布了几项规定，如以后批斗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工作组并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将其发生与处理经过写成简报上送中央。

6月20日北师大与北京地质学院都发生了“6·20事件”，即许多学生给工作组贴提意见的大字报，当天就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击与镇压，数以百计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对北大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满意，在6月20日他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在刘少奇的影响下，仅北京市就把一万多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极端错误的，他仍然用1957年反右斗争对付右派的办法对付学生。他应该知道当时“两报一刊”社论是代表中央文革与毛泽东的声音，学生的行动是能从“两报一刊”社论中找到依据的，学生不会轻易屈服。刘少奇不敢当面顶撞毛泽东，却把一万多学生打成反革命，实际上是与中央文革与毛泽东的碰撞。导致的结果是他加速下台与命丧黄泉。

毛泽东出尔反尔、说变就变。穆欣在《关于文革初期工作组派出与撤销问题》一文中说：这时（指6月上旬）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早已派出去了。毛泽东看到中央转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发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根据江青的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

约在7月12日左右，曹轶欧到北师大找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了解文革具体进展情况。7月16日，曹轶欧与吴德到北师大撤销了孙友渔工作组组长的职务，任命刘卓甫为新的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7月13、19、22日的中央会议上，又连续三次提出，主张把它全部撤销。7月25日与26日连续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揪斗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他们把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康生在讲话中说：“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学生办的造反小报上说，康生这样讲后，“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捣鬼！”

7月26日，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陈伯达说：“在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7月27日，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带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反复强调工作组是绊脚石，号召学生搬掉石头自己闹革命。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了北京市委7月28日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都讲了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讲话时也说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最后讲话的是刘少奇，也是作检讨。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对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有点不理解，感到十分奇怪，最后被毛泽东的突然出现转移了思路。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提出中央另外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谁都可以看出，是指刘少奇等中央第一线负责人。从此以后，刘少奇节节败退。

学生从“8.18”接见红卫兵时首长排序中看到刘少奇的位置从原来的第二位一下子跌落到第八位，领悟到了刘少奇的失势，八月下旬清华大学首先出现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这股风马上席卷全国。刘少奇的倒台直接原因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从后来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看，也有他本身的原因。

毛泽东思想就是刘少奇到延安后树立起来的，他用毛泽东思想整倒了无数的对手，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哪一次不是他刘少奇挂帅？借毛泽东思想整别人，到最后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 “破四旧”与大串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北京高校纷纷起来“破四旧”，其中成绩卓著者，当数北师大的“捣毁孔家店”。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在曲阜毁坏文物6618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这幕的丑剧所造成的损失，是全国“破四旧”之最。

随着“破四旧”是全国大串连。各地的大中学生仿照北京，批各地、各校的党政领导。受到打压的学生纷纷到北京上访。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也使得许多青年人羡慕之至。他们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不畏千辛万苦，踏上了进京的征程。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各地学生涌向北京。与“万众进京”的同时，北京学生奔赴全国“煽风点火”，把北京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北京到外地的红卫兵，被各地学生看成是毛泽东派来的，他们的“造反”行动也被誉为“首都精神”、“中央精神”，

以至于北京红卫兵的言行常常成为各地运动的发展方向。在他们的策动下，各地学生“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省、市的党委都难逃一劫。

值得一提的是聂元梓到上海串连，是直接领了毛泽东的任务去的。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主席就是说，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大家都是作为党交给的任务来执行的。……当时我和校文革常委们的思想都认为是执行毛主席亲自交给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把上海的运动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时，对北大和我个人来说，对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有感激思想和特别热情完成任务的心情。”

这个大串联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他要利用北京学生，把文革的火种播向全国。他得逞了，北京的星星之火，在学生们的煽动下，果然成了燎原之势。

四. 批斗王光美与“揪刘火线”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本人又以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清华大学的文革。因此批倒批臭刘少奇夫妇是文革的特大重点。利用红卫兵来整肃政敌也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奇招。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由三十多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王光美出场前被强迫穿上不合时宜的夏装旗袍，脖子上挂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超级项链，脚上穿了高跟鞋。作为一个国家夫人被丑化与羞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批斗王光美的同时还拉上了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与200多陪斗的清华大学中上层干部作陪斗。会上，蒯大富作了题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发言，原工作组组长叶林也反戈一击，作了《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的批判发言。还有那个美国人李敦白也来凑了一下热闹。值得一提的是李讷在4月10日当天一大早就出现在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拍摄了批斗王光美的新闻记录片。

两个月后，毛泽东的手伸向了曾经把他捧上神坛的刘少奇，而在前台出力的还是北京高校的学生。1967年6月3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要求刘少奇到建工学院作检查。然而，像文革中所有的检查一样，刘少奇的检查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假认罪，真反扑。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在中央文革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效仿建工学院。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8月5日上午，“揪刘火线”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名义，缺席声讨刘少奇。同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耻辱的“刑场”上握手诀别。此后，中南海周围的摊点全部撤离，清洁队洒扫马路，红墙外终于恢复平静整洁的局面。

“揪刘火线”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但发生在1967年有它的合理性。报刊点名批判刘少奇，中央文革全力支持学生“揪刘”就是促使它由小变大的“策动力”。但奇怪的是1970年后，此事被列为“5.16”集团的重大反革命阴谋活动，建工学院老八一女头头贾健怀孕三个月，军宣队在大会上批判贾健，不让贾健结婚，无奈之下贾健只能打胎。其二把手董临平，被整得上吊自杀身亡了。新八一的女头头范兴慧在西安也被整得很惨。因参与“揪刘火线”挨整者成千上万，那几大学生领袖的罪行中都有这一笔。

六. 揪斗彭德怀

1966年12月中旬，在戚本禹的授意下，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押回北京。1967年7月中旬，在北航的小型“审斗会”上，因彭德怀“态度不好”，韩爱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师大、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大揪斗彭德怀时，将早与他离婚的浦安修（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抓来陪斗，让彭德怀示众时，因他是光头无头发可揪，干脆拎着他的两个耳朵让其示众。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少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彭德怀身患结肠癌，没有对他进行正常的治疗，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时年76岁。

戚本禹只是中央文革的普通成员，他的背后是谁就不言自明了。

文革的起点该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对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曾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矛头所向直指彭德怀。

“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毛泽东引以为豪的伟大创举，当时的口号中总有一条：三面红旗万岁！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以事实为基础，揭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严重恶果，这便是彭德怀难逃厄运的根本原因。

七.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革的前台演员是红卫兵与造反派，他们中少数人是直接奉旨办事，多数人是“两报一刊”社论与“中央首长讲话”作为行动准则。文革灾难深重，它的罪魁祸首，非文革的发起者、红卫兵的红司令莫属。

虽然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文革的实际走向并不完全以其个人的意志而转移。北京1966年的“十二月黑风”与“二月逆流”是群众与上层对毛泽东的公开对抗，到了1967年各省市两派严重对立，“7.20 武汉事件”显示了危机的总爆发。毛泽东抛出王、关、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预示着文革的失败。

1968年全国到处发生武斗，北京高校也分裂成“天派”与“地派”，清华、北大、北师大都发生了武斗。此时毛泽东也只能派军、工宣队进驻高校，几大学生领袖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奇怪的是“势不两立”的“天派”、“地派”头头在70年左右都被“隔离审查”，罪名是“5.16分子”。昔日“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成了文革的替罪羊。■

【评论】

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

智晴¹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全国大串连和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聂元梓那时对大串连不积极，曾派人到北京火车站劝阻外出的北大学生回校参加选举校文革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指导下，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选举产生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校文革成立后，大部分学生很快外出串连了（选举前已经走了一部分人），留在学校的人已经很少。这些留下来的师生，除参与辩论本校运动的有关问题、转抄外面的一些大字报外，主要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二年级学生路远、周闯贴出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校文革筹委会组织的斗陆平大会是“文斗变成了温斗”，批评聂元梓不支持红五类单独组织协会等。大字报还写到：

“选举，选举，选不出好班子来。此处浪费青春，外地正好革命。走了！那么多人发了紧急呼吁，要聂元梓等注意。可是她们却置之不理，不抓事物苗头，忙于事务。三千人跑了，陶铸同志的信才来。聂元梓同志何其迂也！”

“何其迂也”的聂元梓，是否接受了路远、周闯等人的批评，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1月中旬，聂元梓和孙蓬一等人也要赴上海串连去了。对于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连一事，当时不少人曾猜测是否有什么背景。就连时任上海市第一书记的陈丕显等上海市委领导人，亦感到聂元梓突然出现在上海并与当地造反派联合行动，来头实在不小。

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据笔者了解，并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聂元梓此次行动确实是奉命行事。做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中央文革的某个头头或某些成员，而是最高领袖。

1966年11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李讷即肖力（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在北大校文革组织组某成员的陪同下来到北大五院二层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当时在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的有孙蓬一等5、6人，笔者亦在其中。李讷身着军服，一见面就冲着孙蓬一说：“孙大炮，怎么听不见你放炮了？”原来文革初期孙蓬一曾借调到中央文革工作了约两个月，与李讷认识。孙为烈士子弟，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是一直性之人，为人耿直，脾气火爆，敢于直言，人称“孙大炮”，故李讷也称他为“孙大炮”。接着，李讷便同孙及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李讷问孙：聂元梓呢，到哪里去了？孙答曰：大概到市里开会去了。随后李讷便询问北大的运动情况。孙蓬一作了较为详细汇报，大意是说：眼下北大有反聂，反校文革，说聂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聂元梓下台。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补充了一些情况。李讷听罢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发表了一通意见。大意是说：北大是有点乱，但是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着眼于北大的运动，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造反派受压，尤其上海造反派压力很大，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们。李讷说，今天来找聂元梓就是要同她谈这个问题，这是主席的意思。“这是主席的意思”，此话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谈话到此时，已接进午饭时间，孙蓬一要李讷留饭，李说好啊，我可未带粮票。于是众人便拿着饭盒、饭盆到大饭厅打饭，菜是普通的大锅菜，主食有馒头、大饼之类。那时李讷较为朴素，平易近人，在办公室同众人进餐时有说有笑，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

当天下午，李讷与聂元梓单独长谈。她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聂未作详细传达，只是说毛主席要她带人去上海串连，支持上海的造反派。还说李讷告诉她如果毛主席批准，她也与聂同去上海。听了聂的传达后，校文革的常委们很兴奋，认为这是伟大领袖交给的任务，是对聂元梓和北大造反派的信任。经研究决定，由聂元梓、孙蓬一带队，另有校文革组织组的陈某和傅某参加，此二人均为女性，兼有照顾聂元梓的任务。聂随将此名单报告

李讷。不几日中央文革办事组送来了北京至上海的4张软卧车票（系一个软卧包厢）。聂孙一行随即赶往上海。至于他们在上海进行了什么活动，笔者只有耳闻，不知其详。

就在李讷同聂元梓单独谈话的当天，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的少数学生砸了由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新北大》校刊编辑部。聂元梓陪同李讷看了现场。据《聂元梓回忆录》记载：“李讷到窗前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聂元梓回忆录》第173页）次日，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小会议室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笔者也在场），了解砸校刊编辑部情况。会议开始时王力说：“昨天晚上听了肖力讲北大砸校刊的情况。中央文革听了，很气愤，也很关心，我们今天这里开会，听听你们介绍情况。”会后，王力吩咐北大写一份简报。回校后由简报组组长杨文娴起草简报，聂元梓等看过就上报了。

关于聂元梓奉命赴上海串连之事，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王力在《王力反思录》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小标题为：“聂元梓去上海的一段公案”——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的，我比较清楚。……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连，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说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去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到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陈伯达找到阮铭。这个北京和上海联系的组织，没有牵扯到张春桥。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转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完全作为北大聂元梓领导的群众组织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观察、联络工作，没有说她的任务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给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记者站照顾。”¹

¹ 见《王力反思录》第758页。

王力还写道：“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有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串联。没有叫她打着中央文革旗号。”¹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确实大有来头：奉毛泽东之旨行事。

聂元梓等人自沪返京后，中央文革办事组通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尽快将办事组垫付的聂元梓等人赴沪的四张软卧车票款送还他们，以便结账。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说：这四张软卧车票是你们给买的，北大无法报销，理应由你们负责。对方很快回话，说聂元梓等四人的编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归北大报销，并连连催促北大报销后尽快还钱。北大校文革办公室要他们写一个证明：四张软卧车票系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买的，可以报销。但对方予以拒绝。此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最高领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聂元梓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希图“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见《王力反思录》第758页），又要掩盖聂元梓等人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谓费尽心机。

根据当时的财务制度，只有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方能乘坐软卧。聂元梓是12级，报销不成问题。但其他三人皆为一般教师和干部，只能按硬卧报销。差额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彼时中央文革办事组又频频催促还款，无奈，聂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补齐差额，还钱了事。■

¹ 见《王力反思录》第759页。

【评论】

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

舒声

郑实先生的文章“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¹中提到了校文革的保卫部门——“二组”在文革中整学生中的活动和作用，但叙述的不够详细充分，本文拟对此问题再做一些补充。

据原北大校文革保卫组长谢甲林回忆，他是在1966年6月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被派到北大工作组工作的，担任保卫组(又称二组)副组长；8月4日，工作组撤离后，保卫组全盘人马留下，成为校文革的保卫组，1966年12月，保卫组中的军队人员撤回部队，他成为组长。二组从法律系中抽了几个学生参加工作，有蓝绍江、苑世男等。²

据蓝绍江的说法，二组的工作只是正常的保卫工作，没有介入运动。³但实际情况是：二组作为校文革的工具，参与了大量的整人工作，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整人材料。1967年7月10日，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包括红旗飘、北京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查抄了位于燕南园63号和南阁的二组办公室，发现了大批整学生的材料。据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一文披露，从二组查出的材料包括以下内容：⁴

1. 工作组时期整群众的材料

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遗留下来的整群众的材料，在工作组撤销后不仅没有销毁，而是

¹ 郑实：《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第四集，216-227，2016年8月。

² 谢甲林：《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百年潮》，2012年第5期。

³ 蓝绍江：《我亲身经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华声论坛/时事政治区/参考文摘 2014年8月23日。

⁴ 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全部保留下来，在南阁，法律系工作组整理的群众的黑材料完完整整地保留着，技术物理系351班有14个学生被工作组列为右派，他们的材料也被二组珍藏着。地球物理系64级学生陈必陶等在1966年7月12日最早写出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当时轰动全校，工作组表面上说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但却在暗中整理了陈必陶等人的黑材料，工作组撤走后，二组不仅没有销毁这些材料，而且还继续整，又增加了新的材料。

2. 部分学生“反动言论”和“反动言论集”、教师干部的黑材料

其中包括准备把陈必陶等30名学生打成“反动学生”的材料，他们的反动言行就是“反对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攻击聂元梓同志”，一个同学说：“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动，我想不通。北大不民主，有不同意见不能辩论，这样下去不好，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居然也被列入“反动言论”。1966年底，在北大出现以“井冈山”、“红联军”（以下简称井红）为代表的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但被残酷镇压下去，部分学生被送到专政机关，部分学生在学校或系、班级里批斗，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56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13集，每集都有100多页，“井红”的主要负责人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等，每个人都有“反动言论集”。哲学系65级学生罗雪莹参加“红联军”仅10几天，就有了厚厚一叠子材料，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去年8月底，作为哲学系文革委员的罗雪莹带领20多人外出串联，破坏了哲学系的运动”。在燕南园63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67.5.6，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10个人，中文系62级女生沈达力被列为第5名，她已经在1967年3月17日被迫害自杀了，校文革二组依然不放过她。此外还有物理系奚定平、历史系郑振卿、西语系石天曙（曾任西语系文革筹委会主任）等人也被整了材料。此外，还有一些对聂元梓有不同意见的教师和干部的材料，例如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本来是社教“左派”，只因给聂元梓贴了一张“要整风”的大字报，立刻从“坚定的左派”转化到了“三反分子的边缘”，被整理黑材料；还有化学

系教师郭正谊和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也被整理黑材料。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他们还整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名保护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同志大量的黑材料。

3. 对学生活动的监视与跟踪的记录、笔记本、

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大字报底稿等

二组中的谢甲林等人是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他们把对付阶级敌人那套手段用于对付群众，费尽心机地盯着对校文革有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跟踪，并记录备案。例如哲学系学生、老井冈山负责人胡纯和某日中午与部分同学进行了一次辩论，二组马上就整理了一份辩论的详细情况备案。1967年2月6日，二组的记事本中详细地记录了生物系学生樊立勤的全天活动（生物系电话汇报）。0363“慨而慷”战斗队某人在《参考消息》上划了一些毛笔字和钢笔字，也被如获至宝地送到二组备案，而且由谢甲林亲自批上了意见。更为险恶的是，二组还通过各种手段，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和大字报底稿，其目的是为了查对大字报的笔迹，这些材料有些是从被整对象那里偷来的，有些事是从档案中找来的，查对笔迹的目的还是抓“证据”，进一步整人。

4. 外出调查学生的介绍信、存根和材料

在抄出的材料里，还发现了大批校文革派到各处去调查学生的介绍信和介绍信的存根，有到公安局的，有到监狱的，也有到其他地方的。如派人到公安部14处调查学生牛辉林、牛太生和陈开龙的材料，其中无中生有地捏造了“牛辉林父亲被批斗，妹妹是联动分子，本人是联动头目”等内容。

5. 校文革制定的文件、简报和“情况反映”

在抄出的材料里有谢甲林起草、校文革制定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对敌斗争的点意见》，其中规定：“反对过正确路线，反对过校文革和聂元梓同志的，坚持不改的予以必要的教育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以必要的批判，继续进行反动活动的要酌情进行处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动组织和参加反动组织的，凡是有罪恶的、民愤大的骨干分子就要批判斗争，凡是首恶分子，有严重罪恶的、有民愤的骨干分子要依法惩办。”

在发至聂元梓、白晨曦、杨学琪、姜同光等校文革负责人的第22号简报中写道：“在井冈山等反动组织恶毒攻击聂元梓同志时，一些黑帮分子家属也趁火打劫，攻击聂元梓同志”，已经明确地把井冈山等组织打成了反动组织。

在上报中央的《情况反映》第33期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反逆流以来，我们学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在年级以上批判和斗争的有反动言行的学生和教员有76人，其中中学生70人，教员6人，批斗后经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审查的有12人，留在学校的64人，多数是群众自行决定批斗的。在批斗后留校的64人中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同意批斗的16人，其中批判9人，斗争7人，占25%。”

这个《情况反映》里的数字是大大缩水的，据不完全统计，在镇压“井红”期间，全校被批判斗争的学生、教师达170多人。

通过对以上情况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二组肆意扩大保卫工作范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

二组作为学校的保卫部门，本职工作应该是维护校内治安，防火防盗，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等，但他们却肆意地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那些对校文革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把部分学生和教师当成防范和打击的对象，整理了大量“黑材料”，这些材料有的已经起到了作用，有些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在当时的表现。二组进行这样的活动，超出了它的工作权限，值得提出

质疑。

2) 二组的工作方法十分“专业”，并形成了网络

由于二组的负责人是从公检法部门调来的，他们使用的方法都是公检法破案的方法，十分专业，例如跟踪、盯梢、偷听、偷看、照相、外调等，而且他们的工作已经形成了网络，在各系甚至有些班级，都有“线人”，随时向他们报告被监控对象的言行。

3) 二组是北大校文革的忠实工具

二组只是校文革的一个下属部门，他们的工作是为巩固校文革的统治地位服务的，他们把校文革和聂元梓当成了党和正确路线的化身，无论校文革和聂元梓的行为正确与否，都忠实地为他们服务，而把对校文革和聂元梓有不同意见的群众视为敌人，千方百计地打击，成为校文革的忠实工具。

4) 应该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党的保卫工作历史悠久，曾在对敌斗争中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井冈山苏区保卫部门的“打 AB 团”，到四方面军张国焘、二方面军夏曦和陕北的“肃反”，再到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倡导的“抢救”运动，绝大部分整的都是自己的同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前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工作方法对我国保卫工作也有一定不良影响。文革中，北大校文革二组沿用的还是以前保卫工作中的方法。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应把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用到对人民群众，更不能因为群众对于个别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就狠整一气，造成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北大部分学生查抄了校文革二组，销毁了大量的“黑材料”，虽然看起来是一种过激行为，但其目的是为了避开文革中更多的群众挨整，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

【评论】

历史的求索

——《抢救记忆》阅读随想

黄虹坚

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一是冲着和王复兴几十年的交情，在老朋友的层面我义不容辞。二十啷当岁时，我和复兴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文革中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有的观点和看法在当时也比较接近。他在《抢救记忆》书中写到的一些事，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

二是我自己对文革也有话想说。我们的青春在最重要的和本该最灿烂绽放的时代，和中国一起，蒙受了一段历史黑色岁月。这长达十年的磨难，在中国的每个家庭、每个人心上都刻下了程度不同的烙印，它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我们在社会当下的种种行为中，看到了文革遗风。文革就好比是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的盒子，释放了人性的黑暗阴晦与某些落后丑陋的民族性，而且再难把它们收归盒中。说文革遗毒已清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中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文革旧账是非要时时清算不可的。虽然文革已被宣布结束五十年，但它还在社会生活中像幽魂般徘徊，成为了社会的毒瘤甚至是癌症。

北京大学是中国文革的源头，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命运的序幕，就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拉开的。这一幕为何选在北大开演，北大又经历了哪些文革阶段？许多北大人提笔写过，文章也见过不少。每个人对那段日子的记忆方式不同，每个人也仅能经历他所能经历的历史一隅，也都只是各人的文革印象。但从各角度提供的历史片断，将会拼构成完整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帮助人们正视北大的文革史，也正视中国历史中难以翻篇的重要一章。

北大文革史无疑是中国文革史的一个缩影。

最重要的知情者，我认为还是聂元梓及比较接近她的一些人。这些人若秉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就须有对历史见微知著的眼光，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自我剖析的觉悟。作为史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然后才谈得上资料的分析与观点的确立。

聂元梓对北大文革的回忆，她身边种种人士对文革的回忆，不少已通过海内外正式、更多是非正式的渠道出版了。复兴的《抢救记忆》不是第一本也不会是最后一本相关书籍，但这本书仍是不可替代的。原因是复兴当时不但是北大文革一些重要事件的发起人之一（如“红旗兵团”和“66”串联会），还参与过北大文革一些核心事件（如与聂元梓一起去见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又如见过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而且他与北大上下各层人物都有来往。他虽然低调但是活跃，忆述的一些活动及聂元梓的真实想法，以及不限于北大的北京市文革史实，许多是人们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

我认为这是这册书最重要的价值。

至今我仍记得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我们正在北京长沟峪煤矿与矿工相“结合”，共同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二日早上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文系召令我们回校。在南校门我在敞篷卡车上见到了欢迎的人群和狂热的场面，顿时被感染得异常亢奋，同时内心也充满了不安、疑惑甚至是恐惧。那种情绪的记忆是真实的。但职业令我已把文革幻化成一种文学创作，有时会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情节。现实更需要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提供冷静的、严谨的细节，让人们认识到那一场拿国家和人民命运作政治实验的高层斗争，是如何通过北大文革一个个阶段反映出来的。

复兴充当了其中一个亲历的角色。他把书定名为《抢救记忆》，“抢救”一词便体现出追挖往事的迫切性，同时也表现出他投身其中的责任感。为了避免记忆的错误，为了求证每个细节，我知道这几年他不断地往返美国和中国，放弃了悠闲养生、含饴弄孙的闲淡生活，自讨苦吃，自我折磨，才有了这么一本我认为是一值得一读的书稿。

这册书的内容不限于北大的文革，也记录了复兴家庭的故事。他祖父被囚，父亲挨斗，

至亲弟弟被残害……尊严曾那样地不值一文，生命曾那样地被无情践踏，今天谈论已匪夷所思，但读来仍叫人惊心、愤怒和思绪难平。我父母在文革中也曾被抄家、被审查、被批判、被关闭，当时家人天各一方，音信隔绝。读到复兴书中内容类似的章节，常常感同身受。他一家人的经历也是中国其时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某程度上，它也是一部家庭的文革史。

《抢救记忆》也花了不少笔墨写到复兴自中学起受到的各种“革命”思想影响、成长经历及文革中的种种思考，其中有自我检视，也有他到美国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后对事物进一步的思考。在这角度上说，《抢救记忆》也是他个人的思想成长史。

当然，由于事隔久远，由于观点与角度不同，也由于记忆可能有误，该书对北大文革事实的忆述或会与一些人不同，据我知有的北大当事者就对他描述的事实持反对的意见，但我目前选择相信复兴的版本。说来有几点理由。理由一，复兴就读过北京男四中，从很年青时起就对政治有较深入的观察和关注。如今提起男四中，名字仍振聋发聩。它一直是中国的贵族学校，集合了中国最高层的权贵子弟，那种自以为是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培养，复兴已通过书的第一章作了记述。在这种氛围中，复兴自然也会受到强烈的耳濡目染，对政治产生兴趣。我初到北大时就已从身边一些北京名校生的身上验证了这点。他(她)们虽是平民出身，但受到学校高干子女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管，谁管？”的气势感染，谈论起政事张口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全然是政治局委员互称的口吻，着实把我们这些只敢尊称“刘主席”、“周总理”的人吓一大跳。因此我从不怀疑复兴对政治的敏感和热心。

顺便要说点丧气话，这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吧？以复兴的“右派”子弟出身，那个“天下”能是你操心的？最多也只能是个陪跑的罢了。用今天的网语说，就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理由二，复兴是学历史的。这个学科要求的是缜密的思维和求证的认真。这正如中文系的学生通常都有点小资浪漫一样，复兴也具备了历史学系学生的特点：认真、踏实。

理由三，据我对复兴的了解，他有着拼搏及钻研的劲头。这可能来自于他年轻时对体

育运动的痴迷（他曾是北京游泳代表队的运动员），对认定的目标咬定不放松，老了更把这点发挥到极致了。听他也听别人说过，为了回忆某个细节，他常常失眠，又或者苦苦推敲，又或者找人探访求证。

基于这三点，我对复兴书所记录的内容投信任票。

只要血还未冷，经历了，我们就有责任了。我们的责任就是留下自己用眼睛看到的细节，留下自己用感情感受过的岁月印记，让世人特别是年青人通过不同的历史角度去建构完整的文革概念，共同阻止文革在中国再现，共同抵制文革在中国复辟。复兴努力了。可以想象这二十七万字的书稿是在多少与年老岁月诸种不适、倦怠、失忆的苦斗中完成的。在此我愿意表达对他锲而不舍精神的欣赏，很敬佩运动员出身，北大多项游泳、滑冰、长跑项目冠军的复兴在写书的过程中，给终保持了年青时的顽强和坚毅。我们尽管遭遇了错误和荒谬的文革，但仍保持了值得自豪的品格，因为我们都曾沐浴过北大校园的自由求实之风，我们都曾是北大人。

这册书也必会遇到各种批评和责难，特别是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对立派朋友的激烈反应。尽管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一起吃喝旅行，但谈到文革时仍还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由此也可见出文革令民众的撕裂已达到何等程度！即使是我本人，对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也持保留的态度。相信这一切都早在复兴的预料之中，也相信他有接受这一切的准备。言论自由已通过网络风气渐开，有理性的争论是好事。只要认定自己求实求索的初心，复兴就坚持吧，因为我们都曾是文革的见证人。■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二）

——“二月兵变”

陆伟国

二.“二月兵变”

1. 康生是个鬼

果然，极左势力在按照他们的既定意图，步步逼进。他们耸人听闻地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即所谓“二月兵变”，直接指向人民大学。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要为林彪的“五一八”政变讲话提供证据，更是为了一下子就置彭真、贺龙于死地，说就是他们要搞军事政变，直接打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缺口。

所谓“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资料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6月17日，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自然也就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跑不掉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信的人并不多，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也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

月28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这一下，形势突变。当天夜里，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过了零点，又被拖到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都吵了过去。这时候，跟一个月前批斗孙泱时，那架势又大大升级了，戴高帽，搞喷气式，连他的夫人、校纪委书记凌静也被拉来一起陪斗。在大会上呼口号的人，狂吼着：“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必须交代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郭影秋还是很冷静，在一鞠躬后，对人民大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他来人大以后的工作和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一直讲了二个多小时，讲得非常令人信服，至少对我是这样。

但是会后，郭还是被押到我住的东风三楼的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跟了过去，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反郭派的人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法律系旁边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笱到校（还有张经武等人），在文化革命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学生革命热情，但不要大轰大哄，要摆事实讲道理，可以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但不要戴高帽、限制他的自由等等。在这个会上，也同时宣布工作组撤离。下午，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郭影秋刚担任了二个多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

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也被当作黑帮一

样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还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越想越气，一时议论纷纷、群情激昂，终于压不住了（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改称为文化革命广场，是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二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

此时的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笱（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说明，但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

彻夜未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驻地找康生。那是北海西侧的一个大院，清代某王府的一个院落，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等一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

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这儿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校长郭影秋。他原是江苏沛县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务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当地的学生和青年起来武装抗日，活动在湖西一带。这儿的湖西，是指微山湖的西面。湖西，后来在我的生命中也留下过一页，在那儿住过一年半。建国初期，郭影秋任云南省长。那时的省长后来都担任了很高的职务，但他却在1957年秋反右之后，不避风险，不当省长当校长，来到了南京大学。1963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被康生诬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而罢官。周恩来想调郭影秋当国务院代秘书长，但他却谢绝，而应吴玉章校长之邀来到人大。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郭为人大党委书记。同年5月20日，国务院第131次全体会议任命郭为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始终把学生和教师放在心上，维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尤其是在种种政治高压之下，尽其所能，保护了一批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活简朴，来人大后，不要豪宅，就住在和我们隔了一个篮球场的二处，和我们一样的灰旧的老房子，还是平房。五间房，一个院，很有点农舍的味道。老伴病了，他自己背她上车。就这样一个事务繁忙的领导，他还是位明史专家，主攻南明史，写有《李定国纪年》的专著。他在诗词上也很有造诣，是党内高层的一位才子。他的史学著作和诗词，可不是像现在泛滥成灾的名为戏说、实为胡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艺，更不是“羊羔体”、“泪流帝”、“纵为鬼也幸福”的那些胡言乱语。现在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高校领导，和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真是难望项背，差得十万八千里。

下面摘录郭校长所写的一首《满江红——四十初度有记》，以饗读者：

“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回首处，云烟往事，空余涕笑。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尽神难肖。望遥天、独自立黄昏，心如绞。

青山在，柴已少；黄花瘦，骨犹傲。怕秋虫夜语，孤灯斜照。蒲柳漫兴迟暮感，烛火偏向黎明曜。挥长铗、纵手斩妖魔，风狂啸。”（请见：《郭影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诗中的“脱胎”二字，在当时大字报里写的是“拔毛”，那可是当时的一大罪状。可能是在出版时，郭校长作了修订。其实，这首诗写于1949年9月，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禁忌。我在大字报栏里，看到这首诗时就佩服得不得了。

南京大学的教工，这多少年过去了，也一直在怀念老校长。在南大汉口路校区的北校园里，有座郭影秋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在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落，绿影婆娑之中，我凝视着我们的老校长、好书记。四周静静的，有白发的老人安详地领着儿孙，有年青的伴侣缓步细语，而我则沉浸在当年难忘的时光，久久不忍离去。

2. 邓小平表态

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像现在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政治风浪也能锤炼和涌现出一些不凡的人物。这次辩论会上，就有一位国际政治系63级的女同学吴廷嘉表现出色。她口才极佳，发言时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言辞犀利、精彩不断。一时间成了校内名人，被戏称为“吴老娘”。她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幸于1997年病逝。痛哉，又一位人才的离去。

那天，直到半夜后，辩论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

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工作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取经的。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决策。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件新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这个问题确实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我们在文化革命发动之后，搞了一个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这件事看来在开始时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快地感觉到工作组这种形式阻碍群众运动。实际上群众能够自己革命，有能力、政策水平、思想水平，能进行好的。这些我们感觉得迟了，这点，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同志就是犯了错误的，错误在我们这些人是经常有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批评完全应该，应该经常批评。这个对帮助党中央工作同志、市委工作同志、各级工作同志是很重要的一条。派工作组这件事情，我这里要重复说一下，这是新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的。这点要负责任，我们中央在北京的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现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新市委又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工作组又干什么呢？就是要同志们自己干革命，就是建立在相信我们大中学校学生、大中学校的教师职员工人同志自己能把文化革命干好，建筑在这个相信上面、这个基础上面，作出这个决定。

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对“二月兵变”进行了说明。他说：“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在北京，分配一些营房，后来军队同志感到住在学校里又出来军队和学校混起来也不好，所以只是这么一件事。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而且邓小平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8月4日被迫在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

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康生是个鬼，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卑鄙、最恶劣的小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反而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大人物的怀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以北方沿海一个村镇为背景，叙述了中国农村从1949年到1989年的社会变迁。书中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当然，中规中矩的大辩论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8月12日，校文革筹委会说是人大红卫兵将纠集5000红卫兵来斗郭影秋，结果大批保郭观点的职工、学生把东风二楼（将郭保护起来的暂住地）团团围了起来，加以守护。开始了两派“武装割据”的苗头。

8月20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然而，这次大会的气氛已不同于半个月前，辩论中常常有争吵和起哄，陶铸对此不满。他说：辩论要有个气氛，就是赞成的意见让他讲？辩论嘛，就是有不同的意见才辩论嘛，如果意见都是一致的，还要辩论什么？我们不是讲民主吗，讲民主大家都有讲话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公安局抓去了嘛！在这里都不是现行反革命犯，都有讲自己意见的自由。要辩论就要有个气氛，有个环境，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能够讲完，讲完他们的意见，使辩论能很好地进行下去。但对于郭影秋，他没有完全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虽然不是革命左派，但他不是黑帮，既然不是黑帮，那就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

有个说法，当时中央领导有个分工，各自有“蹲点”单位，以保持与基层的联系，了解运动进展的第一手资料。邓小平、陶铸的“蹲点”单位，或叫联系单位，就是人民大学。

但此说法，目前无正式出版物佐证。不过，陶铸在倒台前的几个月里，真的是多次接见过人大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在左倾时期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后面都要专门讲到。

在文革中，如郭影秋所受到的摧残比比皆是，有些更加泯灭人性、惨绝人寰的事例真是叫人毛骨悚然。此处仅举一例：《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陈学政，《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1968年，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的毛远明、毛远春姐妹俩，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对立面的残酷迫害。这姐妹俩，是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俩既是毛泽东的堂侄

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在她俩所受的种种酷刑里，竟然还有被烧红的烙铁直插阴部！最后她俩都死于非命。毛泽东在事后见到申诉材料时，良久无语，最后说了句：“明妹子、春妹子，没有问题啊，是清白的啊。”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1966年8月20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证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展开，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9月7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9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等等。

可是，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那天，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七）

——对我的审查拉开帷幕

宋翔雁

第一节 审查简报组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因去银行取钱一事，军宣队借学生大字报质疑为幌子，就开始对我“光顾”了。到69年初，以系副指挥房（或方）××牵头，另外还有两名军宣队员参加，多次让我去北五楼探工系宣传队指挥部，交代在院革委会简报组工作室的情况和问题。开初他的口气非常大，说道：一般情况如机构、成员等写清楚就可以了。重点要交代你们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哪些黑材料，是何人指使的，何人提供的？对这些重大问题，你必须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如前所述，经过几个回合后，似乎发现他们自己的估计有所偏差后，房某就不再来了。此后每次找我谈话或问问题时，就只有一名军宣队员在场（这样肯定不符合规定，但事实如此。从中可知，他们已不再将简报组问题当成大事来抓了）。在审查简报组工作问题上，除房某开始时说话比较没谱外，其他倒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如有段时间大夫开了假条让我半休，他们就只在上午找我去交代或质问，并未发生不让我半休的情况。尽管简报组不存在整黑材料的事，审查只能不了了之。但在简报组审查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们却不愿说出审查未发现问题的结论。相反还要打个圆场，说什么：简报组的事就先到这儿，以后想到什么还可以交代，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总之，正确的永远在他们方面。

因有人打小报告，再度引发对我的批判和审查。起初，军宣队想从“简报组”取得突破，想从中找到造反派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证据”。因简报组确实是造反派掌权后

的组织机构之一，而我又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白丁。如果有点问题就可上纲上线，顺藤摸瓜。这是历来政治运动中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军宣队首先抓的是我在简报组的工作，而且押上探工系军宣队的二把手负责，在宣布让我交代在简报组时期的问题时，该二把手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把简报组都整了那些黑材料写清楚。

可惜，宣传队把功力下错了地方——革委会要求简报编写客观中性，我们这些编辑严格执行上面的规定。所以，我们编写和报送的简报，都是北京市和个别外省市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两派对立的焦点（公开的），两派的支持者，我们所知道的双方下一步的打算等相关事实。内中基本没有我们的看法与分析。用现代语可以说简报是“透明的”，与整中央的黑材料沾不上任何边。所以他们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大概察觉到再搞下去也不可能如愿，更无法向上延伸，也就只能彻底放弃了。此后，无论是清队、抓我现行反革命或抓“五·一六”的各个阶段里，均再未涉及“简报组”时的问题就是明证。

第二节 因评论“红化”受批判

几乎就在审查简报组的同时，一天下午（因那会儿我身体确实有些不适，只因没有去就医拿病休假条，故按以往核心组同意的办法，若无特殊情况，下午仍允许我在家学文件，实则是照顾我休息），教研室通知我去参加室内环境“红化”。因对当时的所谓红化方式（将主席像和语录的外沿儿都加上一圈红纸边，然后再将加了红边的主席像和语录钉在墙上），我觉得实属浪费，没有必要。加上自己没能休息，也有些情绪。所以干活时就情不自禁的说了几句牢骚型实话：主席像和语录都是经中央批准，指定在新华印刷厂印的。若真需要加红边，在印刷时就加了。因干活时环境比较嘈杂，我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仅是靠近我的几个人能够听到。

未曾想到，这句牢骚话就被听到的人反映给军宣队了。当快收工时，来了两名军宣队员，其中一人是我教研室的叶某。他们进屋后检查了一下房间红化的情况，接着另一名军

宣队员说道：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做得很好，干得很认真，表明我们对伟大领袖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是，也有个别人，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对红化问题评头品足，说什么红边让印刷厂一印就可以了。他不懂得这里有一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我们不能让这种错误的言论过夜，今晚大家还要到这里来，对散布这种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批判。最后他才点名说道：宋翔雁，你对自己散布的错误言论要做出深刻的检查，并很好地接受大家的批判。

散会后我一路无语地回到家中，尽管我内心并不害怕，但我真不知道检查该从哪里谈起？而更重要的是，这让我警觉到：我已被军宣队列为异类，而且肯定他们还在群众中宣布了今后要注意我的言行。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被人监视的对象，这才是真正令人生畏的事情！因为，谁也保不准一个凡人平时会做错什么、说错什么。

晚饭后，我按时到教研室接受批判。这是自反干扰后，我第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位置上，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毕竟与批斗不同，除黑板上写有“批倒批臭宋翔雁的错误言论”外，没有其他标语。而批判者的发言，除上纲上线很高、带有很强的谴责语气外，并无声嘶力竭地呵斥，更重要的是没有强迫让我低头或弯腰的粗暴举止。四五名批判者发言后，主持人让我表态并做检查。在表态时，我除了官样文章似的讲到感谢大家的批判和帮助外，我死死地守住了下面一条底线，说道：基于过去的教育，我心中只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和毛选等政治性很强的物品，在制作时都要经过中央指定部门的严格审查，是不允许擅自改动的。但我没有考虑到军宣队是要通过“红化”这一群众自己动手参与的方式，表达和深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崇高情感这一深深的含意，辜负了领导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良苦用心。今后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领导决定背后的政治含义，不清楚的要及时请示，不可用自己的一知半解瞎议论。总之，借坡下驴的目的达到了。

当我表态后，主持人悻悻地但略带暗示地说道：今天对宋翔雁错误言论的批判帮助就到这里，宋翔雁，你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努力改造自己，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

第三节 又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

古语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年初刚刚因评论“红化”受到过批判，但时隔不长，大约在69年开春的四月份，某日一大早我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病（当时要想看病，必须起大早排队等着挂号。挂号一般七时开始，但五点半前必须赶到才可能挂上）。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中，病号们除了看一些自己带的报纸、刊物外，前后相识的往往会聚堆闲聊或听别人闲聊。而我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的闲聊中，又遭到告密者的暗算。

事情是这样的：周末，我回岳母家看望家人、孩子（当时岳母还住在城里没搬），当八九点钟孩子大人都要睡觉时，我才起身骑车前往前面提到的老人家那儿（因岳母家实在挤不下）。在路经外交部大门前时（当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我偶然发现站岗的解放军士兵右手弯着放在腹部前方（虽然天黑光线也较暗，但执勤战士因手戴白手套，就非常显眼）。尽管我骑车一闪就过去了，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站岗的战士为何不是双手下垂，而是一手弯曲放在腹前呢？为探明就里，不死心的我又调转车头往回骑了一段路后，再度折返回来。当快到岗哨前，我极其注意地朝站岗的士兵方向看，终于看清了战士弯曲的手臂是因他手中拿了一本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并紧贴在他的腰带处。“探明”就里后，我想真应了别说怪事年年有，哪有今年怪事多的传言。

文革中的怪事就可谓很多了，诸如“忠字舞”、红化、“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要先与总机话务员对讲主席语录后，才能接通分机号码进行通话等。但我觉得今晚我所看到的哨兵右手持语录本站岗可谓怪事之最了！因为常识告诉我，哨兵是在要害部门前，或最重要、最容易出事的地段，执行警戒任务的特殊武装人员。对他们的要求是警惕性极高、基本功过硬、遇事冷静且反应敏捷。如今却让哨兵右手持语录本站岗，一旦遇到敌特来袭当如何处置呢？！若先将语录本放入衣带内再掏枪，则肯定晚敌一步而失去战机命丧敌手，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而若立即将语录本丢弃并掏枪拒敌，虽可能还来得及，但这又有对伟大领袖不够尊重之嫌。这可真让战士为难了！

带着自己也觉得难有两全解决办法的疑惑，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求战士手持语录本站岗，建议最好改为左手持语录本，这样就不会影响战士遇到情况立即掏枪的要求！一路上我还为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奇妙想法十分得意呢！正是因为这种心境，故在等待挂号的过程中，我就将所遇到的“怪事”和我前后的想法与我身后排队的人谈了。对方听后既未符合也未反对，似乎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下午当我正在家中休息时（当时我仍在半休中），突然听到单元门被很重的敲打着。开门后，一看是7165级的两名学生。只听一位大声说道：马上到北五楼4××室接受批判。我奇怪地问道：我现在是半休，正在煎药呢！他回答道：知道你在半休，是军宣队叫你去的！于是我只好穿好衣服，把药锅端下火炉，封好火炉后随学生一起前往北五楼。一进4××室，就看见墙壁上贴着“批判宋翔雁的反动言论”，而且宋翔雁三个字还东倒西歪地贴着。看来屋里有二十几名学生和两名军宣队员，他们依墙围坐着。对着屋门处有一小块空地儿，让我站在那儿（实际上等于将我围在了中间）。

我十分纳闷，究竟又出什么事了，如此这般！这时只听一名军宣队员站起来说道：宋翔雁，今天叫你过来，就是让你如实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论，接受群众的批判。你要端正态度，绝不允许躲躲闪闪。因事发突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清门道，真是觉得无从谈起！但我也深知，此时绝不可简单化地否认、硬顶。必须耐心找到原由，方能比较好的加以处理。因此，我尽量用缓和的语调说到：刚才您让我如实交代反动言论一事，我真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我深知自己出身不好，思想上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工作和生活难免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需要认真地接受教育，很好地改造自己。但我也知道，自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自初一下学期开始不久，一直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我热爱党，积极靠拢党的组织，一心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动的思想，所以也就不会有反动言论。我真的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违规的事情，引发今天对我的批判。我诚心地请求给我必要的指点，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言行，我绝不会有任何隐瞒。我的上述表态尽管中间被一名学生和宣传队员打断，但主持会的军宣队员还是

让我把想说的话讲完了。

面对我诚恳的表白，会场的气氛略有缓和。于是有的同学问我：你说过哪些解放军的坏话；有的有问：你对解放军有过哪些攻击；责问最重的是：你为什么总把仇恨对准了解放军？对于这一系列的责问，我都沉思状的缓缓摇头并轻声地回答道：没有！在这一系列的责问未能达到目的之后，突然有一名学生问道：你今天上午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立马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身心压力也就立刻全部释放了。所以我即刻坦诚地回答道：我想起来了，请允许我把问题交代清楚。我今天是按医生的要求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验血结果，并就诊取药。在排队等挂号的时间里，我与一名排在我身后的学校职工讲述了前晚在路过外交部门前时看到的情况，并和他讲了我的想法。

接着，我将相关事实和我的想法如实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并接着说道：如果大家说的就是这件事，那我认为也许是当时我没能仔细地将情况向他讲清楚，或也可能他有所误解。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恶意，没有攻击解放军的意思。只是觉得应该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觉性才这样想的。面对我的陈述，因觉得我没有回避和隐瞒，学生们似乎认可了，甚至有的学生还点头也觉得我的想法不无道理；而两名军宣队员，只见他们彼此低语了一会儿后，主持会的人说道：你能如实把事情说出来还是好的，但因你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解放军战士，所以总要犯低估他们的警觉性和对敌斗争的实力。这就要求你今后必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自己，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水平。

散会后我如释重负，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在医院我是和谁谈起了这件事呢？但我始终也想不起来，而且事后我还多次想过，也都是无果而终的。此事令我非常气愤，因为当时我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重要情况讲给他听的，如果听者觉得不妥，为何不能直接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警告，而偏偏采用卑鄙小人的告密伎俩呢？！应当说，告密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告密和极权是一对孪生兄弟，极权统治者需要告密者作为震慑民众的一种辅助工具，以便让民众能够俯首贴耳，听命于极权统治者的号令。

所幸的是，诸如“红化”、“红海洋”等极端媚俗的个人崇拜浪潮，疯狂到69年三、四月份，就因中央文革领导人在一次接见革命群众的集会上予以否定而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哨兵也不再持语录本上岗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人对我过去的这些言论再说三道四，更没有人再加以指责了。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中央文革否定了“红海洋”，而反过来对我加以肯定。因在极权时代，真理从来也不在平民百姓一边，只有掌权者本人，才是真理的化身，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资本。面对当时的现实，我内心已十分平静，完全不会为这些事再去争论谁是谁非了。但我深知，军宣队既然已经盯上了我，今后肯定还会有各类审查等着我呢。他们和工作组一样，绝不会认错，也轻易不会放弃对怀疑者的审查。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抓的阶级敌人越多，就说明他们越革命、成绩就越大。这就如前阵子的官员们追求GDP数字一样，GDP值越高，就表明他的政绩越好，高升的机会就越大。从某种程度上讲，二者如出一辙，反映出的问题实质就是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低下。但就当时的自我而言，我只能落脚于今后做任何事都要更加谨慎，以不出大的差错为原则。■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三）

王复兴

11、陈伯达“6.5讲话”，“66串联会”出世

6月5日清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¹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²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6.5”讲话。

¹ 陈伯达6月5日清晨有没有到北大讲过话？对这一史实人们争论较大，我是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本人的记忆，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6.5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6.5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另一次是6.5深夜在人大会堂。6.5清晨在北大饭厅的讲话，聂元梓口述录音带整理的《口述自传》中，对陈伯达6.5清晨在北大饭厅附近的讲话，有详细回忆的记录。我在6月5日上午在校园已看到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即“北大是一潭死水”。这句话陈伯达6.5晚在人大会堂没讲过。但这句话在6月5日、6日两天就已在北大传开了。许多北大校友都记得在6.5日、6日已知此句话。那么陈是在什么时间讲的呢？应该就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讲的。陈的这句话极具杀伤力。它意味着北大必定分裂，必定大乱。当时对我震撼极大，记忆深刻。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事与尘埃》中的《九十回眸》第272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² 《陈伯达1967年6月5日的讲话》，见《记忆》，第143期。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在6月5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午大棒，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6.5”两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攻势。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什么施出如此重手？这里有个直接的背景，即5月27日的中央文革接见。（聂元梓《回忆录》误记为5月28日。这次接见会的详情，我们学生都不知道，只听说了一些皮毛，详情是四十年后才知道。

5月27日下午2:00，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把聂元梓叫到钓鱼台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聂元梓回答“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关锋插话“北京分两大派，你要负责。”“你态度不好。”关锋又说，“你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也没表示同意合作。关锋、戚本禹没等聂讲完话，便拂袖而去。聂元梓见状很不满，便起身退席，陈伯达追上来对聂讲，“不要生气呀，我们要合作哦。”¹

2004年我拜访聂元梓，聂对我讲“江青、陈伯达他们，当年要我‘合作’，上他们的‘船’，我不肯。于是就整我，整新北大。”聂的意思，应是主要指此次“5.27接见”。此次接见表明，中央文革是个整体，很难把王、关、戚从中切割出来。这应是聂元梓一直对“5.27接见”的详情保密的原因。实际上，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江青，这种认识，我是在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才悟到。但是当年不但认识不到，根本不敢朝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且认为要捍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25、226页。

陈伯达6月5日清晨在北大的讲话，于6月5日上午就有人在校园贴出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北大一下炸了锅。6月5日晚陈在人大大会堂的讲话，在6日也传遍校园。下面排个时间表，看看从6月6日至6月9日这短短三天，在陈伯达6月5日的二次讲话后，北大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干是化学系0363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0”派人数较多，约有近1000人。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樊立勤）和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成立时没有多大反响，但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红旗飘”是五个反对派组织中最左的一派。

陈伯达的讲话影响极大。那几天，我原来的一些观点一致的好友，有些也脱离了“公社”，分裂了出去。如《横扫千军》的徐云辉、原来“红旗兵团”时的战友杨百瑞、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好友李炳煌等。

以上三天，从“新北大公社”分裂出去了三个反对派，加上5月时成立的“红”、“飘”，人称“井、红、团、0、飘”。北大师生再次分裂，燕园大乱特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直至武斗。这就是陈伯达“6.5讲话的社会效果，反观其动机，昭然若揭。效果验证了动机，动机导至了效果，动机、效果高度一致。

同在6月8日，“新北大联合战斗团”（人们称其为“联战”）成立，对校文革和聂、孙

采取死保态度，抵制对校文革整风，尤其推崇孙蓬一。头头是卢平，主力战斗队有历史系“桔子洲”等。人数有1000多人。

6月9日“六六串联会”最后登台，发表《声明》，稳住了“新北大公社”动荡的局面。“6.6”声明，反对分裂，坚持批左，支持聂元梓，但要求聂元梓、孙蓬一纠正错误，继续整风。《北京大学纪事》说6月9日“6.6串联会”发表了“八点声明”，“声明”是由16个战斗队联署。这一记载不准确并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被错误引用，以讹传讹。6月9日“6.6”的声明是“九点”，不是“八点”；有20个战斗队联署，不是16个。抬头是：《首都红代会 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 声明》。有11个系（战斗团）的20个战斗队签名，即：红六团“红色清道夫”、“红梅”；红七团“东方红一支队”、“文二（四）一支队”、红十七团“扫雷一支队”；红一团“红军”、“杨子浪”；红十一团“顶风船”、“舞东风”、“岿然不动”；红九团“大无畏”、“108纵队”；红四团“第二刺刀见红”；红二团“横空出世”；红三团“起风雷”、“全无敌”、“大无畏”；红十二团“红旗”；红十五团“挥斥方遒”；跨系的“横扫千军”。

这批著名战斗队极有影响力。“66”的声明贴出后，一下稳住了“新北大公社”不断分化的趋势。“九点声明”的落款最后是：“联络地点38楼 313 502”。313室是“红梅”王复兴、王渊涛、俞政、徐森、张文虎5人的宿舍。502室是“红色清道夫”刘庆柱、张绍清等人的宿舍。

6月14日，“六六串联会”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在38楼前，红旗林立，歌声嘹亮，口号不断。大会进行一半，下起大雨，游行开始，冒雨行进，行至图书馆前广场，进行宣誓，气氛悲壮。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3000人左右。大会由我主持，黄虹坚领呼口号。口号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到底！”、“干扰斗争大方向的井冈山、东方红决无好下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聂元梓、孙蓬一必须纠正错误，继续整风！”、“排徐左、右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据后来粗略统计，“66”当时有6000人之众，在北大是人心所向，成为稳定北大混乱局面的中流砥柱。

“六六串联会”诞生的过程是这样：陈伯达6月5日讲话后，由于中央文革在师生中威信极高，“公社”内部人心慌慌。我和好友们都在想：要不要紧跟陈伯达讲话？要不要脱离“公社”？我们应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我出面召集了二十个战斗队的队长，从6月6日起，连续开了三天串联会，上午、下午连轴转，讨论形势，交流观点，确定立场。第一次串联会是6月6日晚上在大操场举行，大家围了一圈席地而坐，讨论形势。杨子浪建议“退出公社”，但大多数人主张仍留在“公社”，但要继续给校文革整风。大家强调，校内要反对分裂，反对内战。校外要继续反吴传，反极左。尔后杨子浪也赞成了大家的意见。三天串联会会议由我主持，我记得参加串联会讨论的有：王渊涛、俞政、陈双基、索世暉、杨子浪、黄诗云、陈振民、马云龙、程仁双、赵春福、史新国、任瑚琏、阎志胜、李长啸、马西沙、沈永友、胡宗式、金崇顺、黄虹坚、张绍清、刘庆柱、彭浩、梁国安、孟关霖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66”的骨干。讨论了二天后，于7日晚由索世暉起草了“九点声明”第一稿。8日开会讨论索世暉的草稿，反复讨论，逐句修改。最后由“红色清道夫”的张绍清起草第二稿。6月9日早，开会通过张绍清的第二稿后，马上抄成大字报并在大饭厅南墙贴出。自此，“六六串联会”在乱局中出世。（有的回忆北大文革的文章，说“66”是聂元梓指使成立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赵建文后来告诉我，6月6日后聂元梓曾找他嘀咕，很担心校文革垮掉。“66”出来后，她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历史系“红色清道夫”的刘庆柱（考古四年级学生）告诉我，系文革的吴维能和魏杞文老师找他，说他们代表一批历史系教师“赞同‘66’，参加‘66’。”杨子浪在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66’串联会就是靠这一纸声明站住脚了。”他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66’登台后对立面明显地树立起来了。”“整个北大无头绪的动乱，看来将在相对稳定的两派对立中进行了。”

有些人说，“六六串联会”的“九点声明”在北大文革史，以至于红卫兵运动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文献。“北京大学纪事”只引用了一句话，是由二条拼成的一句：一条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不共戴天

的仇敌”；另一条是“‘东方红’、‘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据查，“66”从6月9日至13日，先后贴出了三份影响很大的文件（大字报）。下面分别引述并做简要评述。

在6月9日的第一个“九点声明”中，除了“北京大学纪事”引述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那句及警告“‘东方红’、‘井冈山’”这句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大方向，反对打内战。”“北大必须大乱的口号必须批判。”这实际是在抵制陈伯达要搞乱北大的意图。（陈伯达在“6.5讲话”中说“北大是一潭死水”，“你们学校越乱越好。”“6.6”的声明却针锋相对。）由于中央文革、陈伯达当时拥有极高的威望。此外当时我们知道上海的学生造反派“红革会”因“炮打张春桥”而迅速垮台，挨整。因此尽管我们对陈伯达的讲话不理解，但当时的形势决定我们只能“暗抗”，而不能“明顶”。因此“声明”表态“陈伯达同志对北大的批评非常及时，好极了！”“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大造聂元梓、孙蓬一同志错误的反！”对聂、孙的造反严格限制在对聂、孙的“错误”上。但“6.6”对聂、孙错误的批判是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我们坚持自三月整风以来对校文革的批评态度。“声明”指出要“彻底批判聂元梓、孙蓬一的错误，并肃清其影响。”要“边整风，边战斗。”并提出“彻底改组校文革”、“大力提拔革命小将”的述求。“声明”批评了“公社”内部死保孙蓬一错误的“联战”个别成员，指出：“死保孙蓬一的错误只能断送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会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里点出了“公社”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后来到了67年底、68年春，“66”核心成员与孙蓬一在大联合与停止武斗的问题上，发生日益尖锐的矛盾与斗争，66年6月时已露出苗头，只是这种内部矛盾被与对立面的斗争所掩盖。“66”当时的状态是两面作战，对内对外，里外开弓，反对极左。

当时在公社内部，“66”派批评“联战”派“死保”，是指“联战”不应“死保”聂、孙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压制3月整风以来群众对他们的批评。错误地批判提意见的师生是“逆流”，是“砍5.25红旗”。“66”认为“联战”这种态度是为校文革帮倒忙，把许多群众推走。但“66”和“联战”对于更大的原则问题，如反吴传启、反极左思潮、支持校

文革，反对北大分裂（实为抵制陈伯达“6.5”讲话）、保周等大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是困局中的战友。

“66”在6月13日以大字报公布了第二号“声明”，此次才是“八点声明”。署名“临时勤务组”。“二号声明”提出“在新阶段提出的问题是，背离斗争大方向，热衷于打内战，从右的，或从左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现象，在全市，在全国都普遍存在着。在北大尤为严重。”在这段文字中，明确指出存在着左的干扰，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热衷于打内战。”批评道：某些人“企图把红色政权打成白色恐怖”，“重新发动全面夺权，宣扬二次革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方向错误。”此处尖锐批评了“井、红、团、0、飘”的极左思想。“二号声明”还提出红卫兵要开展自我批评，自觉改造思想，指出“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如何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从而如何掌好权，用好权。”要求红卫兵开展自我批评。

上面记述的是“66”的第三份文件（二号“声明”）。在时间顺序上，在“二号声明”之前还有一个文件，是于6月11日“66”“起风雷”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此份大字报是由“66”核心组成员、化学系的陈双基起草，反映了“66”的观点。下面引述2015年6月底、7月初，北大几位校友之间，交流、追忆、核实当年“66”的几份文件，特别是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之情形。

为了寻找48年前“六六串联会”公布的几个文件，杨子浪发电邮向校友胡宗式（当年新北大公社《动态报》负责人）求助，胡宗式找到了“66”的三份文件的底稿，把扫描件电邮给了谢定国（扬子浪）、索世晖、任瑚琏和我。胡宗式后来告诉我，“66串联会”的文件是孙蓬一保存的，而后辗转到了胡宗式手中。这三份文件是：“六六串联会”的一号“声明”（即九点声明）；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二号声明（八点声明）。扬子浪收到胡宗式寄来的资料后，回复电邮：“宗式兄，谢谢寄来的文件，是北大文革史的珍贵历史资料。也拜读了你最新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北大有些人反聂，现在还拿聂说事，都可以理解。但把‘反聂’吹嘘成‘革命’、‘正确’、‘反文革’，甚

至是‘继承了北大传统’，就滑稽了。祝好。谢定国。”

第二份文件是03（化学系）“起风雷”战斗队的大字报，“起风雷”是谁？我想不起来了，猜想可能是化学系的陈双基，于是发电邮向他询问，果然是他，陈双基回电邮告诉我：“复兴：你好！信收到，难得胡宗式还保存有当年‘66’的资料。03起风雷是化学系我们班战斗队的名字。我是写过一篇长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都是咱们一帮人讨论过的观点。写完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南角的南墙上。随后在31楼西边的食堂里，召开过一次研讨会，讨论大字报提出的内容。”

6月11日陈双基代表“66”写的这张大字报，评的是陈伯达在6月5日晚在人大会堂批聂最重的一句话。对陈双基这张大字报，王渊涛曾多次说，此大字报把陈伯达所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句话扭了过来，顺了过来。意思是把政治上判了死罪的一句话，解释成因世界观的问题而犯了一般性错误的问题，解释成知识分子必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问题。大字报说，“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动摇无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北大运动一直是走在前面，当学生运动显示先进性时，我们打了第一炮。现在学生运动走入歧途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也带头犯了错误。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清醒。我们要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从错误中杀出来。”“这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对聂元梓、孙蓬一的殷切希望。”

该大字报借陈伯达的批评，对学生运动中的普遍性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批评，这应是扬子浪记忆中的红卫兵首次公开自我批评。大字报指出当时红卫兵中普遍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愈闹愈多，愈闹愈大。”这是同时批评了北大、北京的两派。后来派性泛滥，爆发武斗，思想根源盖源于此。大字报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有两面性。”“身上带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应当“对自己坏的一面引起高度注意。”

大字报尖锐批评了本派校文革的领导，指出“个别人，不认真改造自己，就必然被历史所抛弃。”“聂元梓、孙蓬一同志，猛醒吧！”大字报重点批评了本派的孙蓬一“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右倾或‘左’的可爱，进而打击、压制不同意见。”“66”的这一认识，后来成为在“公社”内部“66”派反对孙蓬一坚持打内战、搞极左的思想基础。

“66”的三份文件，抓住了人心，赢得了众多师生的支持、拥护。6月14日大游行之后，“六·六串联会”一度成为新北大公社的主流，也是当时四分五裂的北大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众组织，有6000多师生。

我和索世晖当时是“六六串联会”的召集人。“66”没有固定的“勤务组”（总部），核心组成员有：王复兴、索世晖、沈永友、扬子浪、陈双基、任瑚琏、阎志胜、李长啸、张绍请、刘庆柱、马西沙、黄虹坚。沈永友口才好，为人沉稳，后来成为“66”的对外发言人并主持群众性大会。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因缘际会，我被形势推到北大运动的风口浪尖。“66”成为“公社”的主流有二个月时间。8月初，对立面“井、红、团、0、飘”联合成立统一的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同时，“新北大公社”的“66”和“联战”也实现联合，重组了“新北大公社”总部。我就乘机急流勇退了。

12. 聂元梓带我见李敏

大约在6月下旬的一天，聂元梓让校文革办事员找我，我见到她后，只有她一人，她只简单地说了句，“你跟我去个地方”，我便坐上汽车跟她走了。小车开到国防科委宿舍楼，她留下司机，下车后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李敏。”随后她带我一人去了李敏（毛泽东女儿）家。看起来她和李敏很熟，进屋坐下就聊天。聊了一小会，她对李敏说，要借红机子（可直通中南海的保密专用电话）用一下。李敏说，行。后来俩人又闲聊了一会儿，我坐在一旁插不上话。不知什么原因，聂没打电话，就带我回了北大。在李敏家大约只呆了

30分钟左右。我一直好奇，聂元梓那天要给谁打电话？说什么事？但我不好问她。或许，她只是向我表示，她有一条通天渠道。此外我有个感觉，她当时对“六六串联会”非常信任并且依重。

那时，校文革开会，聂元梓有时会派人叫我列席。

13. 谢富治接見北大校文革

6月15日，“井、红、团、0、飘”召开批判聂元梓资反路线大会。他们要聂到场，接受批斗，聂拒绝出席。他们便宣布举行静坐抗议。所谓静坐像个热闹的大聚会，一片喧闹。

针对北大混乱局面，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协助解决北大问题。6月20日下午，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北大校文革代表。聂元梓通知我去。在接见时，聂元梓要求市革委会帮助解决北大的混乱局面。谢富治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念了几段，然后说，“北大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造反手段对待校文革是错误的。”等等。另外，他讲了一段历史，讲的是“在长征途中，张国涛闹分裂，另立中央。”的事情。（我当时心中闪过一丝不快，感到这是暗示聂元梓反吴传及其后台是针对中央文革某些人，是分裂中央。）谢又说“北大没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委会的责任。”（我觉得这似乎是反话正说，正面引导。）聂元梓回校，传达了谢富治有利于校文革的讲话，“新北大公社”士气大振。聂元梓比较冷静，马上布置了校文革继续整风的事项。

“六六串联会”在与“井、红、团、0、飘”对抗的大形势下，仍坚持对自己所支持的校文革进行严格整风，督促校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改变官僚作风。“66”这种对外、对内两线作战的状态是难度挺大的作法。有一次给聂、孙开门整风，群众提意见，炮轰校文革，“井、红、团、0、飘”竟然冲击会场，于是“66”又马上回过头来对他们进行抗议游行。

6月26日、27日两天，校文革举行了整风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做了检查。聂元梓的检查较好，孙蓬一不够诚恳。“66”战士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继续整风。29日校文革

再次召开整风大会，孙蓬一再次做检查，此次老孙有很大进步。扬子浪在“日记”中写道：“老孙这次检查好。”

14. 关于牛辉林

7月上旬的一天，“六六串联会”在办公楼的小礼堂召开大型串联会，讨论形势。我主持会议。会议刚开始，牛辉林就领着“红旗飘”的十几个人冲进会场。牛辉林冲上主席台，从我手中把话筒抢走，并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把我推下主席台，我反身要再上主席台，牛辉林站在台上，竟对着我胸部，居高临下踹了我一脚。我为避免武斗，领着几百名“66”群众撤了出去。“66”有的群众埋怨我窝囊，但如不退让，就会爆发武斗，几百人还不把牛辉林他们十几个人给打惨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干呀。那时要坚持正确的做法很难，但必须坚持。

事后我对朋友们说，牛辉林算那门子造反派呀？造“66”群众组织的反，算造反？把我推下主席台还用脚踹我，算是造反派？我只是个群众，又不是走资派，我好歹和他在文革前还是北大体育队的队友呢，同在运动员小食堂吃饭，常见面的呢。我在田径队，到了66年冬季未名湖一结冰，运动队领导就把我临时从田径队调到冰上队，准备参加高校冰上运动会。牛辉林练花样滑冰，我练速滑。俩人都是正经八百的北大冰上队队友。我在66年1月的北京高校冰上运动会上取得3000米速滑冠军（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1月16日有记载），他没取得过什么名次。俩人虽没说过话，但互相都知道的呀！到了文革，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阶级斗争激活了他人性中的什么东西呢？他在“5.25”时，死保陆平，在第一张大字报前面和别人辩论。到了“6.1”广播大字报后，他被群众要求站在校园的桌子上，被学生们围着批判。到了66年8月他又率先组织清一色由革军、革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搞血统论。他因觉得聂元梓、校文革不够左且不搞血统论，到66年11月以后就造校文革的反。到了67夏季又搞极左，反校文革，反军，反周。他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要走向一

个极端，但前后又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性。突出的特点是激进主义，外加风头主义。这是一位在当时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之下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同学。

文革后，赵建文与原“井冈山”负责人徐运朴约会、聊天，十分友好，经常一块喝酒，成为好朋友，两人对北大文革取得共识：认为两派有三点一致：一是两派都保护北大的古迹、文物、图书。北大的古迹、文物、图书，历经文革，毫发无损；二是两派共同建造了校内巨大的毛主席塑像，都迷信、崇拜过伟大领袖；三是两派都保周（保周恩来）。我对赵建文讲，他们的“共识”基本正确，我基本同意。但有一点不对。他们总结的三个共同点，适用于两派绝大多数群众。但不适用于“红旗飘”的核心人物牛辉林。因为他反周，我有重要旁证。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春富和史新国俩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两人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的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赵、史二人当时有些嘀咕，牛辉林对形势的看法对不对？担心“66”会不会站错队？我当时坚定地对他们俩人讲，“总理是好人，不能反，没了总理国家会成什么样子？我们反吴传启、林杰没错！一路走过来看得很清楚，他们是极左，破坏文化大革命。”

在1967年的3月至8月，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牛辉林所谓的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聂说：“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到了许维纲，许维纲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一边’。”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地两派的本质分歧，但“不是所

有单位、所有群众都明瞭。”“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¹ 作为过来人，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当时，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但牛辉林并没有公开讲出他的观点，只是把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做为“新的保守势力”、“老保”，进行打击。牛所说“公社”一派是“老保”，到底“保”谁了？牛没说出口而已。但这种根本分歧，“公社”与“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瞭。

我毕业后，北大在1971年清查“5.16分子”时，“红旗飘”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春节时，历史系领导张万倉老师突然到我北京家里找我。他想到春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他让我到北大历史系给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讲“5.16”的问题。我于是应邀到北大历史系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了1967年6、7、8月北京市、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讲了“5.16分子”是三反，反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军，反周。讲了“红旗飘”成立不久，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就是反周。讲了我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红旗飘”是反革命，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依我对当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观察，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后来发展成全国规模的“秋后算帐”，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在中央上层，是毛、周联手进行清算。毛泽东打倒政敌刘、邓的目标已完成，造反派已无利用价值。周与毛在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政领导系统，需要扫除障碍，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于是便联手“秋后算帐”。真正的“5.16兵团”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对此中央文革有调查员的报告。可是全国竟然抓了300多万“5.16反革命分子”，是文革后期的一大冤案。“5.16”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

1967年8月17日，“井、红、团、零、飘”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候汉青、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迈、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25、226页。

靳枫毅等十一人。组长是周培源。后来陈伯达转达周恩来的意见，让周培源不要当群众组织的头头，组长改为牛辉林。

1967年12月，周恩来委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转告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北大“井冈山”提出的口号有：“‘井冈山’要在北大二次夺权！二次革命！”“砸烂校文革！”、“一切权力归‘井冈山’！”“摧毁老保‘新北大公社’！”我当时感到“井冈山”的这些口号，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且紧紧围绕着一个“权”字。开始时“井冈山”的头头是周培源，我颇感意外。他不是个科学家吗？他的时间、精力应该用在科学事业啊，怎么也卷进群众的派别斗争里来了？“井冈山”拿他当成政治家了。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听说换成牛辉林当了第一把手，感到这样才是顺理成章了。为什么“井冈山”的第一把手没换为徐运朴、候汉青或陈醒迈或郭罗基？而是牛辉林？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火热的阶级斗争大环境下，群众运动有个规律，越运动越激进，领头人也势必是越来越激进的人物，谁激进谁上台。牛辉林在“井冈山”最左、最激进，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这种情形同样在“新北大公社”也出现过。到了1968年北大两派武斗时，孙蓬一对“公社”取得了绝对控制权，甚至有两个武斗指挥被火线提拔进入“公社”总部。而公社总部的李文因力主大联合、反对武斗，而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失去话语权。

15、7月10日陈伯达在大饭厅讲话及“二组”被砸

1967年7月10日凌晨3点陈伯达又一次来到北大的大饭厅，与群众讲话，煽动北大继续分裂、打派仗。就在这次会面将要结束时，在场的一个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7月10日天刚亮，有大批“井”、“飘”、“零”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随后把保卫组人员全部赶走，

由“井”、“飘”、“零”查封、接管了保卫组。紧接着“井”、“飘”、“零”用大字报宣布从二组查抄出大量北大师生的“黑材料”。由于当时保卫组有严格纪律，不参加学校运动，也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也从没搞过什么师生的“黑材料”。“保卫组”在业务上受公安部和市公安局直接领导，负责治安工作。所以保卫组底气很足，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黑材料”的内容。

这一告示发出后，“井”、“飘”、“零”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整个事件是以“莫须有”之名搞打、砸、抢、抄、封，破坏治安机构，践踏法制。而此事全是在“陈伯达指示”下发生的。陈伯达为什么对如此严肃的涉及治安机构的事情，不做调查就轻率表态？唯一解释是他唯恐北大乱得不够，因此抓住个由头就立马煽呼、挑事。¹■

【重要通知】

承启之先生重托，本人自本月起正式主持《记忆》的编发之事，前一段时间，因业务不熟，发送时多有疏漏，请各位原谅。

《记忆》是同仁刊物，作为主办者，我应该对诸同仁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因此凡需要发送本刊者，请告知真实姓名、年龄、所在城市（地区）、教育程度和联系方式。

来信请寄：jiyi0913@126.com

方惜辰

2016-11-15

¹ 以上根据保卫组成员、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摘要，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931期。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jiyi0913@126.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本期校审：庄敬

本期版式：陈国庆